

流動的真實性： 以蘇軾雪浪石爲個案的考察^{*}

張燕莊^{**}

提 要

雪浪石被認為是唯一存世的蘇軾（1037-1101）藏石，但其真偽問題的爭論由來已久。然而，卻沒有人質疑根據我們現代的定義來判斷雪浪石的真偽是否合適。本文通過梳理十二至十九世紀與雪浪石相關的文獻、圖像及物質材料，意在指出古物真實性的問題遠超「真偽」問題，而且判斷雪浪石真實性的標準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十八世紀以前，雪浪石和盛放它的芙蓉盆都被替換過，但這不影響其「真」，顯示了「真」與原件的鬆散關係。十八世紀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的兩塊雪浪石，則必須通過「失而復得」的新造故事來證明其自身的可靠出處。乾隆皇帝結合文本以外的圖像、物質材料以及實地考察，耗時二十多年卻對雪浪石「真偽」得出前後相反的結論。而十九世紀精英階層的疑古思潮使他們對是否存在「真的」雪浪石及芙蓉盆都產生了消極的態度。

關鍵詞：乾隆、盛清、真實性、銘文、蘇軾熱、考證學、觀念史

^{*} 收稿日期：2024年3月5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8月8日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Understanding Authenticity in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March 16-20, 2021)。在撰寫的不同階段，Michele Matteini 教授、安明遠（Stephen D. Allee）先生、郝建文先生、高雲波先生、以及俞瑩先生在材料收集方面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此外，還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哈佛大學中國藝術實驗室（Harvard FAS CAMLab）研究員

中國自古就有對怪石、奇石的珍愛。最早可追溯的史料顯示「怪石」主要以其經濟和藥用價值爲人所重視。¹賞玩收藏怪石、奇石的風氣形成于唐代，出現了大量的吟詠詩文。而直到北宋，對奇石的藝術性肯定才達到了第一個高峰，這與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米芾（1051-1107）等文人的追捧有著直接的關聯。蘇軾，作爲一位在政治、文學、藝術等多方面的先驅，不僅把對石頭的癖好「合法化」，更是將奇石的藝術價值提高到了與繪畫的平等地位。²蘇軾一輩子收藏奇石甚多，然而這些石頭大多已失傳。本文要討論的雪浪石則是唯一被認爲仍然存世的奇石。有趣的是，由於歷史上聲稱爲雪浪石的石頭不止一塊，因此，關於此石的真偽問題自清代就爭論不休。³

學者們在很長一段時間普遍認爲雪浪石和盛放它的芙蓉盆由於黨禁之故，1101年在蘇軾去世後就被磨毀，不知所蹤，直到明朝萬曆年間才再次被意外發現。⁴水賁佑更正了這一看法，他爬梳了宋、元、明三朝文獻材料，發現雪浪石和芙蓉盆並沒有因黨爭被毀壞。事實上，從北宋到明朝正德年間一直陸陸續續有人在定州看到雪浪石的記錄。⁵此研究雖然更正了關於雪浪石保存和流傳的歷史，但是仍然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是認爲只有一個「真正的」雪浪石，即曾經被蘇軾收藏並命名的雪浪石。這一將「真的」（authentic）與「原始的／原件」（original）基本等同的認知是我們現代對於「真實性」概念的理解。這未必符合前現代人的認知，也忽略了歷史上不同時期對「真實性」的理解存在差異和變化。第二是忽略文本

1 「怪石」常被用來作爲貢品，見：《書·禹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閣立本《職貢圖》中清晰地描繪了使團行進路上搬運的怪石作爲貢品。中國藥典文獻裡記錄了最豐富的關於岩石和礦物的知識，最早的可謂是《神農本草經》。

2 對蘇軾文學、藝術方法的成就，可參閱 Ronald C.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在宋代，「癖」與藝術收藏、鑑賞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癖」作爲一種個人表達，總隱藏著對公共事務荒廢的一種擔憂，因此收藏家總是想方設法爲其「癖」正名，蘇軾也不例外，他將收藏者區分爲對「物」的短暫寓情和對「物」的長期留情。這「寓」體現的是收藏者借物來實現自我滿足，而「留」則是單純對物的癡迷，因此，只要是寓情於物則無傷大雅。對此的討論參見：Judith Zeitlin, "The Petrified Heart: Obs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t and Medicine,"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June 1991): 5-6。

3 除了本文會討論到的前雪浪石和後雪浪石，現藏於定州武警醫院內，歷史上聲稱是蘇軾雪浪石的還有現藏於鎮江金山寺的大雪浪石和小雪浪石，見陳瑞楓，《中華古奇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3-4、56-58。

4 郭果六，〈雪浪石的故事〉，《故宮文物月刊》，261 期（2004.12），頁 104-111；馮春江，〈「雪浪石圖」與雪浪石〉，《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 年 3 期，頁 45-49。

5 水賁佑，〈蘇軾雪浪齋銘刻石考〉，《崑崙堂》，2018 年 3 期，頁 12-22。

記載與實物的流傳之間存在的斷層，也就是將文本中對雪浪石連續的記載，誤當成雪浪石實物的流傳有序。在缺乏攝影術與科學鑑定的年代，很難將文本記載與實物直接關聯，即我們無法確定後來的觀者所見的石頭是否為蘇軾曾經擁有的雪浪石。

雖然與「假」/「偽」/「贗」相對應的所謂客觀的「真」對於文物與藝術品格外重要，它往往直接關繫著古物市場和文物價值，但是「真偽」的邊界並不總是清晰明了的，對「真偽」的判斷也並不是所謂客觀的。因此，學者們更加關心的是「真」(authenticity)與「偽」(falsity)的概念，作為一種文化的建構，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和不同情境裡，是如何被理解和認知的。⁶「真偽」的判斷標準不僅隨著時間、空間，發生變化，甚至可以相互轉換，比如現在被我們當成偽造的東西，在二百年前人們卻會認為它是真的。因此，本文並非要去辨別出哪塊是蘇軾當年收藏的雪浪石，因為這一問題已很難考察、確證。但是，通過各個時期雪浪石觀看者的記敘，我們可以討論的是在沒有科學鑑定、沒有攝影術的前現代時期，人們對雪浪石真實性的判斷標準是什麼？這一標準如何與現代觀念中的真偽認知存在差異，又是如何發生變化的？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筆者以期對前現代時期古物真偽鑑定、藏石賞石、以及觀念史等議題有所貢獻。

本文按時期順序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討論十八世紀之前雪浪石的情況，指出並非「原件」才具有真實性。人們會根據需要，對雪浪石及其芙蓉盆進行添加、修補、甚至替換，但是這些行為並不會削弱雪浪石和芙蓉盆本身的真實性。第二部分著眼於十八世紀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的兩個雪浪石。通過它們「再發現」的故事，論證缺乏與原始空間聯繫的雪浪石，其「真實性」則需要仰賴新的歷史敘事。無意間從地底下挖掘而「再發現」的歷史敘述模式則成為解釋空間異位、流傳中斷的強有力話語。第三部分主要討論乾隆皇帝耗時二十多年對兩塊雪浪石真偽的考證。乾隆皇帝運用文獻、圖像及物質材料的多方對比，最終以儒家話語裡的「文質之辯」推翻了自己早期的判斷。這一理論不僅暗含了乾隆的政治目的，而且還反映出此時雪浪石的「真實性」更多還是仰賴器物上所刻的銘文。第四部分則展現十八世紀下半葉、十九世紀考據學占據主流的思潮裡，學者

6 Mark Jones, "Do Fakes Matter?" in *Why Fakes Matter: Essays on Problems of Authenticity*, ed. Mark Jones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7. Denis Dutton, "Authenticity in Ar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 ed. Jerrold Levin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9.

們對假的、偽的有一種廣泛的焦慮，因而他們對刻在石上的銘文普遍不相信，也懷疑蘇軾當年所藏的那塊雪浪石可能早已不存世。

一、不是原件的「真實性」： 基於空間關係的雪浪石（1101-1701）

雪浪石是蘇軾在定州任職時發現的一塊奇石。元祐八年（1093）六月二十六日，此時已經五十七歲的蘇軾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侍讀學士出任定州知州（兼任定州安撫使）。有一天，蘇軾在府治的後圃得一塊奇石。據蘇軾自己在《雪浪齋銘並引》（或稱《雪浪石盆銘》）中的描述，此石為黑色質地，上有白脈，涵有水紋，像及奔流的浪花，遂命名此石頭為「雪浪石」。他將其盛放在一塊白石鑿成的石盆里，盆直徑一丈八，盆邊以蓮瓣為飾，因名芙蓉盆（後也稱「雪浪盆」）。⁷ 為了增加觀賞效果，蘇軾還於石上設有噴水裝置。⁸ 隨後，蘇軾又在文廟後建書齋，將雪浪石置於齋內，齋以石名，曰「雪浪齋」（圖1）。

蘇軾去世後，位於定州文廟的雪浪石、芙蓉盆和雪浪齋就共同構成了一個供後人景仰蘇軾的一個歷史與文化景點，而且這一景點也經歷了一個不斷再造的過程。根據史料，元代出現了很多新的「古物」。首先，元代名儒郝經（1223-1275）有一篇〈題芙蓉盆〉，提到九月五日曾參觀蘇軾的芙蓉盆、雪浪碑。⁹ 這是現存史料中最早提到雪浪碑的記錄。色目人葛邏祿·納新（1309-?）曾在黃河流域和北方各地考察古代遺跡、碑刻，並記錄了十四世紀上半葉雪浪石的情況：

中山府學講堂前有雪浪石，承以丈八芙蓉石盆，盆口鐫蘇文忠公《雪浪石銘》。其石紋作波濤痕，復有若臥牛立鳳之狀者，昔蘇公守定日甚愛此石，構小室置之，榜曰「雪浪齋」云。西廡下一碑，圖石之形，並刻其銘於右。學中又有唐王維畫竹碑二通，一黑一白，世謂陰陽竹也。¹⁰

7 （宋）蘇軾，〈雪浪齋銘並引〉，收入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冊12，文集3，頁2183-2184。

8 孟暉，〈雪浪齋裡的瀑聲〉，《繽紛》，2010年9期，頁156-157。

9 （元）郝經，〈陵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集部，冊1192，卷15，〈題芙蓉盆〉，頁149。

10 （元）納新，〈河朔訪古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593，卷上，頁25。1363年出版。

納新也提到芙蓉盆和一石碑，但是他所提到的這些物質時，提供了更多的細節。第一是芙蓉盆盆口鐫刻有《雪浪石銘》（應為《雪浪齋銘》之誤），這也是存世史料第一次提到此信息。鑑於之前材料都沒有提過，很可能《雪浪齋銘》是在元代才被鐫刻於盆口的，而非像學者們普遍認為是蘇軾本人鐫刻上去的。¹¹ 第二是對石碑的內容進行的描述，即石碑上繪有雪浪石的形狀，並且於其右側刻有《雪浪齋銘》（圖 2、3）。除此之外，此景點又出現了兩塊新的石碑，分別為陰刻、陽刻王維所畫的竹子（圖 4、5）。並無任何證據證明王維曾去過定州，但是眾所周知蘇軾喜歡依竹而居，而且他曾作詩稱贊過王維所畫之竹。¹² 因此，蘇軾之石與王維之竹似乎共同營造了一種文人理想圖景，他們將文人的道德修養展現在他們寄情於竹石之間。

為了維護此景點，除了增加新的「古物」，原本的「古物」也會根據需求進行修補或替換。根據水賁佑的研究，雪浪盆銘在明代萬曆時期至少被重刻過一次，並非原刻。¹³ 直接的證據是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兩兄弟分別於 1602 年和 1610 年到定州參觀過芙蓉盆，並對其盆口所刻銘文狀況做了描述。袁宏道提到銘文已幾乎不可見，僅僅相隔八年後，袁中道所見到的雪浪盆上所刻的銘文反而非常清晰。銘文倘若只是自然磨損，那麼時間較晚的字跡只會較時間較早時的字跡更加模糊，沒有反而清晰的道理。這就出現了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舊的芙蓉盆被換了一個新的做制品；第二種可能性則是雪浪盆還是舊盆，但是盆沿的《雪浪齋銘》則為新鐫。無論是何種情況，銘文都一定被有心人重新鐫刻過，也許是擔心銘文剝落嚴重的芙蓉盆缺失了其文學、歷史的價值。

有意思的是，重新鐫刻並沒有削減芙蓉盆的真實性。袁中道的記載恰恰給我

11 「銘」作為一種文體並不必然鐫刻在物體上。見 Thomas Kelly, *The Inscription of Thing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1-36.

12 (宋)蘇軾〈於潛僧綠筠軒〉：「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使人瘦，無竹使人俗。」收入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編，《蘇軾全集校注》，冊 2，詩集 2，頁 893-894；蘇軾〈王維吳道子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收入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編，《蘇軾全集校注》，冊 1，詩集 1，頁 317-320。

13 水賁佑，〈蘇軾雪浪齋銘刻石考〉，頁 12-22。爬梳資料後，筆者找到薛岡（1561-?）1609 年過訪定州的一則記錄，提到芙蓉盆口銘文時說：「環書銘於巨石盆口，筆蹤半減，存者尚可讀」。因此，可以將新鐫的時間進一步鎖定在 1609-1610 年間。（明）薛岡（1561-?），《天爵堂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間刻本影印），集部，輯 6 冊 25，卷 7，頁 535。

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庚戌春……至州學，觀子瞻雪浪石，黑質而白章，奔騰如浪，盛以蓮花盆，周遭刻銘，字未經摹搨，神理甚完。記書銘時，爲哲宗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旁有槐，中空外裂，亦數百年物，前廡下刻王摩詰竹，又有雪庵書亦言詩」。¹⁴ 這則材料告訴我們，袁中道注意到芙蓉盆上刻的銘文還未經摹拓，因此他認爲這銘文完好地保留了蘇軾書法的精髓。就算袁中道未讀過其兄長於八年前寫到的文字，不知道芙蓉盆上銘文已幾乎不可見，可是石上銘文隨著時間流逝以及觀賞者的摹拓都會多少有所磨損，這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個常識。袁中道肯定不會相信歷經五百年的芙蓉盆銘竟無一絲自然磨損。因此，更大的可能性是他知道銘文爲近來新刻，但依然認爲其爲保留了蘇軾的書法真跡，更沒有懷疑芙蓉盆的真實性。

除此之外，雪浪石也被至少換過一次。關於雪浪石的記錄，在十二世紀和十六世紀都出現了長時間缺乏記錄的情況（也可能是曾經有記錄，後來材料散佚）。哪怕材料的記載並沒有出現大時間段的空白，在沒有照相術和現代科學手段的年代，後來的觀看者也幾乎無法確定他們所見的石頭就是蘇軾的雪浪石。根據蘇軾本人和後來雪浪石觀者的記錄，我們大概知道雪浪石是「黑質白章」，可是自雪浪石於明末「移於士人家」而不知所蹤後，¹⁵ 定州州學里又出現了一塊黃底白紋的雪浪石，余縉（1617-1690）赴定州訪坡公雪浪石時曾見到這塊黃底白紋的石頭：

嘗讀坡公雪浪石銘，心竅志之。以謂中山自宣和後屢經兵燹城市丘墟，此石無復存理矣。辛亥以使事飯於清風店，偶閱壁間有董易農題句，因詢之土人，云：「石在州學，近止數武」，因往探焉。狀大如二斛甕，白章黃質，以水泛之。肌理墳起，下承以石盤蓄水，數石澄潔如鑑，州守作亭覆之。傍有碑圖石貌，並刻公銘，云係公手書，未敢辨也。……石傍題和甚繁，漫漶多不可讀，余徘徊其下，既屬州守黃君天文爲余拓數本，以備山齋如悅之具，而又作詩以記之。坡公不可見，見此石如見公也。此石亦不可恆見，見此石之圖與銘，並今日所作詩如恆見此石也。¹⁶

14（明）袁中道，《珂雪齋近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刻本影印），集部，冊1376，卷4，頁565-566。

15（明）范正脈（1617-1659）曾去定州訪雪浪石，但「石在州學中，兵燹文廟盡火，聞石移於士人家，未獲見也。」見范正脈，《龍圖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據清咸豐四年（1854）刻本），卷4，頁24。

16（清）余縉，《大觀堂文集》，〈定州訪坡公雪浪石（有序）〉，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

辛亥為康熙十年（1671）。余縉早就聽聞過蘇軾的雪浪石，只是一直以為早已不存。因工事在定州清風飯店讀了董文驥（1623-1685）題在牆壁上的詩，又問了當地人才知道雪浪石就在附近的定州州學，於是慕名前往。他仔細描述了他所見到的雪浪石的形狀特徵為「狀大如二斛甕，白章黃質，以水泛之」。

然而，他所見的雪浪石在尺寸與顏色上似乎都與之前的參觀者所記錄的有較大差異。董文驥的題壁詩中也許沒有提，但是當此題壁詩被收錄在董的文集中時，有小字解釋雪浪石為「黑質白章，貯以蓮花石盆，書識年月」。¹⁷ 蘇軾的《雪浪齋銘》的「引子」也提到雪浪石是「黑質白章」，而據筆者所閱讀的材料，在余縉之前，也沒有一則材料提到過雪浪石為「白章黃質」。因此，最原始的雪浪石的顏色應該與余縉所見的雪浪石的顏色有很大出入。另外，關於雪浪石的尺寸，歷來的描述不多，在余縉之前僅有一則材料提到石頭的大小。這則材料指出「有白石巨盆貯小石，石色微黑，有文白縷縷如浪花起」，¹⁸ 而余縉所見之石非常大，「白狀大如二斛甕」，因此，尺寸描述也有所差異。鑑於余縉所見的雪浪石在顏色、尺寸上都與早於他的觀看者的描述相差甚遠，基本可以判斷余縉所見到的並非之前觀看者所看到的石頭，但是在他眼里，這塊雪浪石是「真的」。他賦詩感慨過後，讓定州州守黃天文為其制作幾份關於雪浪石石碑和歷代題詠的拓本，以供其日後賞玩。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在這五百多年間，芙蓉盆銘在明萬曆朝被重新鐫刻過，甚至芙蓉盆本身也被換過。雪浪石在明末也至少被替換過一次。然而，十八世紀以前的觀賞者從來沒有對雪浪石和芙蓉盆的「真實性」有所懷疑，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我認為至少十八世紀以前，參觀者沒有對雪浪石真實性有所懷疑，信息不全面可能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真實性」的理解與現代概念的「真實性」不一樣。他們理解的「真實性」不來自於古物的原初性（originality），即不需要雪浪石是最初蘇軾所擁有的雪浪石，芙蓉盆所刻銘文也不需要是原刻。就像袁中道明明知道芙蓉盆銘為近來新鐫，依舊認為其字得蘇軾書法之精髓。

北京出版社，1997，據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影印），輯9冊60，卷6，頁222。

17（明）董文驥，《微泉閣詩集》，卷8，〈定州東坡雪浪石〉，頁20a。武進董元起校刊本，出版於1687年左右。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18（明）薛岡，《天爵堂文集》，卷7，頁535。

這種對「真實性」的理解很類似 Alexander Nagel 和 Christopher S. Wood 提到的「替代原則」(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即圖像和建築被理解為一種類型的符號(tokens of types)，這種類型與模糊的起源(origins)相聯繫並且貫穿這一符號的序列。因此後來的復制品可以成為丟失的原件的有效替代，在這一時間序列上復制品會被當成原件，得到與原件同等對待。而這種「替代原則」來自於前現代時期人們擁有一種不同於我們現代社會的歷史觀：

在前現代時期，所有的藝術品被認為具有雙重史實性：人們也許知道這些物品是在最近被製造出來，但與此同時，人們就像對待非常古老的物品一樣，重視和使用這些新造物。這一行為並非自欺或者怠惰不理會，而是一種全面理解藝術品史實性的思維方式。而這一思維方式卻不斷地被現代藝術史研究所誤解。¹⁹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袁中道眼里，重新鐫刻或重新換了新盆也還是蘇軾的芙蓉盆，而沒有影響到芙蓉盆的真實性。

只是在雪浪石的個案中，這種「替代原則」並非完全沒有條件的。雪浪石或芙蓉盆作為一種類型的符號，離不開它們所服務於的「景」，即它們與其周圍的空間關係。如果我們進一步詳細考察歷代雪浪石觀者的記錄，則會發現，雪浪石和芙蓉盆與位於定州的雪浪齋是不可分隔的。表一梳理了蘇軾去世之後，十八世紀之前，目前仍存的雪浪石的觀賞記錄：

表一

觀者	記錄	雪浪石位置
張舜民 (約 1034-1101)	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卻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 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 ²⁰	雪浪齋

19 Alexander Nagel and Christopher S. Wood, "Towards a New Model of Renaissance Anachronism," *The Art Bulletin* 87, no. 3 (September 2005): 403-415.

20 (宋)張舜民，《畫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1037，卷2，〈蘇子瞻哀辭〉，頁12。元符三年(1100)五月，此時已64歲的蘇軾被赦，調令北歸，第二年(1101)當蘇軾途經江蘇時，時任定州官員的張舜民開始修葺整治雪浪齋，並且重新安置好雪浪盆和雪浪石。可惜當張舜民要寫信給蘇軾告知此事時，便於同年九月收到蘇軾於常州去世的消息，於是悲痛作這首詩以致哀悼。

觀者	記錄	雪浪石位置
潘自牧 (1195 年進士)	雪浪石在郡文廟前，狀雪浪，鑿石盆為芙蓉型以盛之。 ²¹	定州文廟
郝經 (1223-1275)	戊申（注：1248）秋，道士李師於中山治所後堂故基，得東坡先生雪堂圖書，……九月五日觀於芙蓉盆、雪浪碑下，因書一絕，以寓感云。 ²²	未提
劉因 (1249-1293)	邵家水陸說影象，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仙人歌感應，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塊磊須得銀河噴。嘲嵩陸華天不嘖，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杯冥漠玄都門。小璫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忘國，作詩一笑君應聞。 ²³	未提
納新 (1309-1368)	中山府學講堂前有雪浪石，承以丈八芙蓉石盆，盆口鐫蘇文忠公《雪浪石銘》。 ²⁴	中山府學
葉盛 (1420-1474)	東坡雪浪齋石 ²⁵	未提
耿裕 (1430-1496)	《中山懷古》：雪浪石猶在，眾春園未空。 ²⁶	未提
魯鐸 (1461-1527)	駁石依稀雪浪痕，一經題品古今論。 山中亦有瑰奇石，不遇芙蓉丈八盆。 ²⁷	未提
都穆 (1458-1525)	發慶都六十里至定州，入州學，謁韓魏公祠……學前有東坡先生雪浪石，黑質白章，盛以石盆，盆為芙蓉之形，其唇有東坡銘，今半已剝落，盆北碑刻「雪浪齋」三大字。 ²⁸	定州州學
張壁 (1474-1545)	訥庵吾祖吾其孫，好尋古墨窮本原。為言有石雪浪翻，學在定武今尚存，我來見石儼在盆。如有神鬼護其根。坡翁銘石僅數言，與石不朽還初元。 ²⁹	定州州學

21（宋）潘自牧，《記纂淵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930，卷 21，頁 476。

22（元）郝經，〈題芙蓉盆〉，頁 149。

23（元）劉因，《靜修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至順元年刻本），集部，冊 1198，卷 14，〈雪浪石〉，頁 595。

24（元）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上，頁 25。

25（明）葉盛，《荈竹堂碑目》，卷 6，頁 3a。清咸豐四年（1854）南海伍氏刊本，愛如生中國金石庫。

26（明）耿裕，〈中山懷古〉，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二十二「藝文」之「古今人詩」，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頁 69a，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11626678>（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5 日）

27（明）魯鐸，《魯文恪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隆慶元年（1567）方梁刻本影印），集部，冊 54，卷 4，〈觀東坡雪浪石〉，頁 53-54。

28（明）都穆，《使西日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刻本影印），史部，冊 127，卷上，頁 640。

29（明）張壁，《陽峯家藏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嘉靖二十四年世恩堂刻本影印），集部，冊 66，卷 21，〈定州學和東坡雪浪石銘〉，頁 468。

觀者	記錄	雪浪石位置
袁宏道 (1568-1610)	入學宮，觀雪浪石及輞川陰陽竹 ³⁰	定州州學
薛岡 (1561-?)	己酉（1609）……至定州，州古中山地，……博士衙有白石巨盆貯小石，石色微黑，有文白縷縷如浪花起。坡老題曰「雪浪石」，而以大楷書，環書銘於巨石盆口，筆蹤半滅，存者尚可讀。 ³¹	定州博士衙
袁中道	庚戌春（1610）……至州學，觀子瞻雪浪石，黑質而白章，奔騰如浪，盛以蓮花盆，周遭刻銘，字未經摹搨，神理甚完。 ³²	定州州學
張鼐 (1572-1630)	庚申（1620）五月……十六日發慶都入定州境，定州古中山國，韓魏公、蘇長公常帥其地，有長公雪浪石在州學中，有魏公眾樂園在城北。 ³³	定州州學
韓上桂 (1572-1644)	定州學正齋前有兩槐樹、雪浪石，皆蘇長公所遺。 ³⁴	定州州學
鄭鄮 (1594-1639)	定州雪浪石文理可愛，東坡鑿石為蓮花盆盛之，旁有老槐，亦坡手植，蓋五百餘年物矣。 ³⁵	未提
劉體仁 (1617-1676)	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草書「中山松醪賦」。 ³⁶	未提
范正脈 (1617-1659)	石在州學中，兵燹文廟盡火，聞石移於士人家，未獲見也。 ³⁷	士人家
梁清標 (1621-1691)	寒照鹽堂寂，眉山此舊遊。蓮花浮玉井，彩筆落銀鈎。片石蛟龍護，孤亭日月留。徘徊人不見，春草自深愁。 ³⁸ 昔人愛石築柳亭，亭廢重來讀此銘。仿佛句中風雨集，驚翻雪浪書冥冥。 ³⁹	未提
杜濬 (1622-1685)	昔賢為事不同流，元祐時人看作仇。斯石解逢知己在，夜隨風雨到儋州。 ⁴⁰	未提

30（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崇禎二年（1629）武林佩蘭居刻本影印），集部，冊174，卷11，〈場屋後記〉，頁520。

31（明）薛岡，《天爵堂文集》，卷7，頁535。

32（明）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4，頁565。

33（明）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影印），集部，冊77，卷30，〈使東日記并詩〉，頁88。

34（明）韓上桂，《蓬廬稿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天啓間刻本影印），集部，冊78，〈五惜之四惜怙恃〉，頁113。

35（明）鄭鄮，《崋陽草堂詩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民國二十一年活字本影印），集部，冊126，卷1，頁535。

36（清）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872，頁123。

37（明）范正脈，《龍圖詩集》，卷4，頁24。

38（清）梁清標，《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清康熙十七年（1678）梁允植刻本影印），集部，冊204，卷6，〈定州觀雪浪石〉，頁71。

39（清）梁清標，《蕉林詩集》，卷16，〈讀雪浪石銘〉，頁230。

40（清）杜濬，《湄湖吟》，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間刻本

觀者	記錄	雪浪石位置
董文驥 (1623-1685)	定州東坡雪浪石：黑質白章貯以蓮花石盆，書識年月。 ⁴¹	未提
王士禛 (1634-1711)	雪浪石在定州學，作亭覆之。……予審視盆四面刻紋作芙蕖，唇上周遭即公手書銘。惜不及摹搨，旁一碑刻石圖，下方「雪浪齋」三大字，亦公書。 ⁴²	定州州學
余縉 (1617-1690)	辛亥（1671）以使事飯於清風店，偶閱壁間有董易農題句，因詢之土人，云：「石在州學，近止數武」。因往探焉。狀大如二斛甕，白章黃質，以水泛之。 ⁴³	定州州學
周容 (1619-1679)	石在定州文廟，是宋蘇文忠公知定州時，所留雪浪齋中，物高二尺、廣三尺餘，蒼質白理，承以石盆，旁勒銘，有亭覆之。……旁有枯槐似渴筆，相傳手植同松寒…… ⁴⁴	定州文廟

根據以上整理的表格，除了並沒有明確提及雪浪石位置的，其他提及雪浪石位置則包括：雪浪齋、定州文廟、定州州學和中山府學。事實上，這裡提及的幾個地方都指涉同一空間。由於行政區劃分的變更，定州州學即為中山府學。另外，定州文廟與定州州學其實是坐落於同一建築群體中，因為自北宋始，中央則將州學與文廟結合在一起，開啓了廟學合一的體制。⁴⁵ 因此，雪浪石所在的中山府學就座落在文廟建築群內，一般文廟建築都采用中軸式布局：文廟於東，州府學於西（圖 1、6）。因此，在康熙朝以前，蘇軾曾經建的雪浪齋一直坐落在定州文廟（也即定州州學）靠後的一排。

而雪浪石的觀賞者多為遊訪定州時慕名前往州學文廟建築群參觀，借此景來抒發與緬懷蘇東坡。他們對雪浪石的真偽似乎有些漠不關心，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因為雪浪石主要是服務於「景」的存在。它的真實性較少來自於石頭本身，而更多是與雪浪齋及周圍古物、碑刻陳設之間所形成的密切關係。雖然我們並無法知曉後來的參觀者所見的石頭是不是蘇軾的雪浪石，但是，因為定州的文廟一

影印），輯 7 冊 22，卷 3，〈蘇文忠雪浪石〉，頁 294。

41（清）董文驥，〈定州東坡雪浪石〉，頁 20a。

42（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影印），集部，冊 1699，卷 22，頁 133。

43（清）余縉，《大觀堂文集》，卷 6，〈定州訪坡公雪浪石（有序）〉，頁 222。

44（清）周容，《春酒堂詩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四明張氏約園刊四明業書本影印），冊 66，卷 2，〈雪浪石歌（有序）〉，頁 261。

45 定州州學於政和三年（1113-1128）升置中山府學。見郭聲波，《宋朝官方文化機構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頁 177。

直在，雪浪齋自北宋始也一直座落於文廟建築群，所以只要石頭在文廟里，那麼參觀者就不會懷疑雪浪石的真實性。爲了服務於「景」的完整性，雪浪石、芙蓉盆都是「類型符號」，可以修補與替換，而且不會降低其「真實性」。因此，雪浪石是否爲原件，並不是十八世紀以前觀看者對其真實性判斷的標準。

那麼，這種基於「景」的真實性，也會因古物與其「景」分離時，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下一節則轉向雪浪石於十八世紀頗受真偽爭議的命運，而這一切都肇始於它們在空間上脫離了蘇軾建於文廟的雪浪齋。

二、「失而復得」的雪浪石： 新的歷史敘事與空間異位後的「真實性」（1702-1766）

在十七世紀中葉，定州文廟、州學建築群因戰火被破壞。幸運的是雪浪石和芙蓉盆在此之前被轉移到了一個土人家，躲過此一劫。⁴⁶這也意味著雪浪石和芙蓉盆離開過定州文廟的雪浪齋一段時間。當它們與雪浪齋這一空間的緊密聯繫被打破後，它們的真實性便無法再依賴於其空間位置。因此，再次出現在大眾視野的雪浪石，則需要提供自身可靠的來源和出處。這主要反映在兩個關於雪浪石的「失而復得」故事里，而這兩個「再發現」的故事都運用了同一個歷史敘述模式。

（一）康熙年間創造的雪浪石「失而復得」的故事

第一個是雪浪石於明萬曆年間「失而復得」的故事。它是關於雪浪石最傳奇的、也是廣泛被學者們用來解釋雪浪石流傳經歷的史料。本節試圖指出雪浪石在明萬曆被「再發現」應是於康熙年間才產生的故事。但是透過這一後來創造的故事，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人判斷古物的真實性的觀念變化。

這一廣泛被採信的故事是這樣的：雪浪石和芙蓉盆在蘇軾去世後就消失了，而直到萬曆年間才分別被定州兩位官員——郭衢階（1546-?）和唐祥興——再次發現。郭衢階曾在定州所轄的眞定縣做縣令，於萬曆八年（1580）無意間在土里發現了盆棱，挖出來一看竟然是蘇軾的雪浪石盆。而定州知州唐祥興於萬曆十五年

46（明）范正脈（1617-1659）曾去定州訪雪浪石，但「石在州學中，兵燹文廟盡火，聞石移於士人家，未獲見也」。見范正脈，《龍圖詩集》，卷4，頁24。

(1587) 又意外發現了雪浪石，並洗濯以歸故地。至此，雪浪石與雪浪盆又重聚了(圖 7、8)。這一令歷來學者信服的傳奇經歷事實上存在著諸多疑點。

首先，就算唐祥興真的挖出一塊石頭，他怎麼能確定這就是消失了幾百年的雪浪石呢？郭衢階是四川富順人，並且是一個有名的書畫收藏家，目前鈐有他收藏印的畫作都是比較頂級的，其中包括臺北故宮所藏的蘇軾的《歸去來兮辭》手卷。⁴⁷ 根據地方志，郭衢階於萬曆五年(1577)任職真定縣縣令，萬曆九年(1581)離任。⁴⁸ 唐祥興是湖廣人，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任定州知州。⁴⁹ 萬曆八年和萬曆十五年時，郭衢階和唐祥興確實分別在定州自己的任期內，理論上完全有可能發現芙蓉盆和雪浪石，可是芙蓉盆尚有銘文可以幫助識別，而唐祥興又如何能確定自己偶然發現的石頭就是消失了幾百年的雪浪石呢？

其次，也是最大的疑點，就是既然萬曆十五年(1587)芙蓉盆與雪浪石失蹤後再聚首，那麼從萬曆十五年至清代以前，竟沒有一則材料提到此事，則顯得十分蹊蹺。明代共修過三次《定州志》，分別出版於明代弘治六年(1493)、嘉靖元年(1522)和萬曆四十七年(1619)。雖然這三部方志現已散佚，無法給我們提供更多線索，但是仍然有很多萬曆時期形成的石碑和文獻材料。定州石刻館藏有若干與唐祥興有關的石碑，立碑時間在萬曆十五年至萬曆十九年，恰好在唐祥興任定州知州時，但是無一塊石碑提到過發現雪浪石的事跡。⁵⁰ 除了石碑資料，袁宏道、薛岡、袁中道分別於萬曆三十年(1602)、萬曆三十七年(1609)和萬曆三十八年(1610)參觀過雪浪石與芙蓉盆，也沒有一人提及過這個失而復得的傳奇故事，顯得十分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一「失而復得」的故事並非

47 目前所知的鈐有郭衢階收藏印的作品包括唐代閻立本的《步輦圖》(北京故宮藏)、唐代韓滉的《文苑圖》(北京故宮藏)、元代趙孟頫的《行書千字文》(北京故宮藏)、唐代韓幹的《神駿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六朝顧愷之的《洛神賦圖》(遼寧省博物館藏)，還有蘇軾的《歸去來兮辭》手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8 河北省正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正定縣志》(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2)，第40章「政府」，頁527。

49 (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九「名宦」之「知州」，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頁14b，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11626678> (檢索日期：2024年11月15日)

50 石碑包括萬曆十五年(1587)的《唐祥興遊開元寺塔詩刻石》、萬曆十七年(1589)的《重修韓魏公眾春園祠堂碑記》、萬曆十八年(1590)的《中山太守唐公重建眾春園記》和萬曆十九年(1591)的《中山大夫唐公德政去思碑記》，見定州市旅游文化局編，《定州碑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45-55。

發生在萬曆年間，而是一個後來形成的故事。那麼它是什麼時間形成的，誰記述的，以及目的是什麼呢？

追蹤此故事最早出現的材料為康熙四十一年（1702），直隸巡道劉德芳所寫的《重修眾春園記》：

宋時帥定者，多文武重臣，而韓蘇二公稱首，其勝跡則韓有園，曰眾春，蘇有石，曰雪浪。自靖康淪沒，元明易代，定非復宋之定矣。而園與石俱滅於灌莽，不可復識。明神宗時，有正定令郭衢階，偶獲其盆，而州守唐祥興復掘其石，洗濯以歸故地，祥興又搜眾春遺址，復其園，建室以祠二公。⁵¹

此篇文章是為當時定州知州韓逢庥（1655-1738）重修定州眾春園而歌功，因此劉德芳則先介紹了一下眾春園的歷史。它乃宋朝時名宦韓琦（1008-1075）所建，命名則是取「與民同樂，偕眾同春」之意。由於韓琦和蘇軾為到定州任過職的兩大名臣，因此韓琦的眾春園與蘇軾的雪浪石則成為定州最有名的兩處歷史遺跡。⁵²劉德芳在文章強調，靖康之變大宋王朝南遷後，眾春園與蘇軾的雪浪石都淹沒於荒草、無人問津。直到明萬曆年間，郭衢階、唐祥興才分別找到了芙蓉盆與雪浪石，不僅如此，唐祥興也找到當年眾春園遺址而重新修繕此園，還在園內建室以祭拜韓琦、蘇軾兩公。

劉德芳所講述的這段歷史也並非完全準確。首先，上文已經論證，郭衢階、唐祥興對芙蓉盆、雪浪石的再發現的故事是有問題。再者，這裡對唐祥興的事跡描述也有夸大成分。根據現存兩塊石碑《重修韓魏公眾春園祠堂碑記》（撰於萬曆十七年）和《中山太守唐公重建眾春園記》（撰於萬曆十八年），唐祥興確實於萬曆十六年（1588）搜得眾春園遺址，並重建此園，還於同年稍晚時候重修韓琦祠堂。⁵³但是，沒有一則明代材料里提過唐祥興重新發現雪浪石，也沒有材料顯示唐

51（清）劉德芳，〈重修眾春園記〉，出自（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22，「藝文」之「古今人詩」，頁1b-2a。

52（宋）韓琦，〈定州眾春園記〉，出自（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21，「藝文上」，頁24b-25b。

53 萬曆十七年（1589）春，陳文燭（1525-?）撰《重修韓魏公眾春園祠堂碑記》，萬曆十八年（1590）春，區大相撰《中山太守唐公重建眾春園記》并摹勒上石。

祥興曾將蘇軾祠堂移入眾春園。⁵⁴ 之後參觀過韓魏公祠的人，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出光（1583 年進士）、真定縣推官王聘用。他們分別於萬曆十八年（1590）、萬曆十九年（1591）參觀韓魏公祠，但是無一人提到過韓蘇合祠。⁵⁵ 這更加確定唐祥興只重修了與韓琦有關的眾春園和韓琦祠堂，並沒有參與任何與雪浪石或蘇軾有關的活動。

劉德芳是漢軍正紅旗人，籍直隸文安縣，康熙四十一年寫此文時正任直隸巡道，官級比韓逢庥高，因此推斷應是韓逢庥委託他來為自己重修眾春園打響聲望。這種情況下，關於眾春園與雪浪石的一些歷史信息很可能是韓逢庥提供給劉德芳的。雖然這則短短的描述里，史實描述有很多問題，但是卻告訴了我們了一個真實的目的，即通過誇大唐祥興的功績而來宣揚韓逢庥的功績，因為韓逢庥幾乎做了跟唐祥興一樣的事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劉德芳的描述裡，唐祥興發現了雪浪石，自己墊錢重修眾春園，並且在眾春園建室祭拜韓琦、蘇軾兩公。韓逢庥也有同樣的舉動，他用自己的俸祿來翻修眾春園和韓蘇祠，並且還打算把曾經放置在州學的雪浪石和芙蓉盆也一並搬入眾春園，可謂比唐祥興還進一步。讓定州兩大文化遺跡——眾春園與雪浪石——合二為一（圖 9）。

這樣的敘述除了拔高韓逢庥的功績，另一方面也使韓逢庥將雪浪石搬入眾春園的這一行為合法化。前文已經一再強調雪浪石的真實性與它所座落的雪浪齋（即州學／文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倘若雪浪石離開了定州州學，搬入眾春園，其「真實性」則不可避免地大大削弱。因此，通過這個「失而復得」的故事，一方面強調唐祥興和韓逢庥行為的延續性，使韓逢庥的移石之舉有典可法；⁵⁶

54 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九「名宦」之「唐祥興」條（頁 14b），只提到他「嘗以夢故捐復眾春園，肖像祀韓魏公」，同時參考同書卷五「古跡」之「韓蘇公祠」條（頁 17a），也沒有提及唐祥興移蘇公祠入眾春園的舉措，反而是在他之前，「正德十四年（1519）……州牧王瓊移（作者注：蘇軾像）祀於眾春園」。另外，同書卷五「城池」之「文昌宮」條（頁 14a），亦提到「正德十四年（1519），知州王瓊以督學命改祠蘇公於名宦，移祠眾春園。」更多細節補充在卷十八「祭祀」之「韓蘇祠」條（頁 11a）：「明正德十四年，州牧王瓊移祀名宦、鄉賢，後與韓魏公合祀眾春園，祀期同陽公祠」。

55 萬曆十九年（1591）王聘用撰《眾春園謁韓魏公祠》石碑，石碑高 49 公分，寬 89 公分，現存定州市博物館。何出光撰《謁韓魏公祠走筆嗣陳五岳韻》，石碑高 223 公分，寬 92 公分，厚 38 公分，碑額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見定州市旅游文化局編，《定州碑刻》，頁 51-53。

56 在傳統儒家文化中，譜系（lineage）的建立一直與正統性（orthodoxy）息息相關。方聞曾討論過統治階層往往要利用道統上承認的正統的譜系來支撐自己政治的合法性。Wen C. Fong, "The Orthodox Line of Tao," in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ed. Wen C. Fong and James C. Y. Wat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257-259.

另一方面，也很好地解釋了雪浪石和芙蓉盆的消失和重現。雖然我們無法斷定這則傳奇故事的原創者是誰，但是這一故事很顯然是有助於韓逢庥當年的一大舉措：將雪浪石移置衆春園。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服務於觀賞景點的「真實性」還在延續。雖然韓逢庥得以將雪浪石與芙蓉盆移入衆春園，但是他又選擇在衆春園內新建了一個雪浪齋（亦稱後雪浪齋），使雪浪石、芙蓉盆和雪浪齋依然緊密地「陪伴」在彼此身邊（圖 10）。

韓逢庥移石入園不久，就接到康熙皇帝西巡要駐蹕衆春園的通知。韓逢庥於是又添建供皇帝理政的大殿和休息的寢宮（圖 10）。衆春園修繕完畢的第二年，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康熙皇帝西巡途經定州時就住在行宮衆春園內。此次西巡除了考察吏治民風，更是通過祭奠山川與名人樹立了認同儒家文化與中國歷史的勤政愛民的聖君形象。⁵⁷ 因此，韓逢庥將蘇軾遺物雪浪石移入行宮並在行宮內新建一個雪浪齋，與康熙皇帝此行目的可謂不謀而合。康熙應該對韓逢庥的安排甚是滿意，離開衆春園時還給他寫了一首詩。韓逢庥立刻將此詩找工匠鐫刻到石碑上，並且在衆春園內建了一座御書亭來陳列康熙皇帝的墨寶。⁵⁸ 自此，這塊雪浪石和芙蓉盆則一直被放置在衆春園內，成為行宮的一景。

綜上所述，康熙年間被劉德芳記載的這則故事並非天衣無縫，但是它成功地給雪浪石和芙蓉盆的身世增加了一層傳奇色彩，解釋了流傳中斷的情況，更使韓逢庥移石入園的行為合法化。

（二）乾隆年間出現的第二塊雪浪石及其「失而復得」的故事

大約六十年後，在離定州不遠的臨城（今河北省邢臺市），挖掘出了另一塊雪浪石（圖 11）。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塊石頭才被認為是真正的雪浪石。巧合的是，它的發現也伴隨著一個「失而復得」的傳奇故事。

這一發現過程歸功於時任趙州州牧的李文耀（1719- 約 1775）。據李文耀奏，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天，他於臨城挖掘出了另一塊雪浪石，而此石是康熙年

57 常建華，〈長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討〉，《社會科學》，2011 年 5 期，頁 134-146。

58 關於御書亭的建造，始自康熙朝，可參閱 Jonathan Hay,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a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5), 311-334。

間臨城縣令宋廣業（1649-1719）從定州搬運至臨城的。⁵⁹ 宋廣業此舉主要是因為他計劃在臨城建造自己的小花園，除了建亭鑿池，雪浪石無疑將會成為小花園一大景觀。只是後來宋離開臨城後，亭子和雪浪石都荒廢無人打理，花園也雜草叢生，以至於衙門的人把此地當成馬棚。可當地人說凡是把馬繫在此石上，馬就咆哮、走路走不穩、不敢吃草、不敢小便，否則則會走路踏空、生病以至於死亡。州牧李文耀聽聞此事，覺得蹊蹺，則親自前往臨城宋廣業曾經建造小花園的故址，找人掘土，這才發現半埋在地下的一塊石頭。清掉石上的青苔，並用水沖洗後，石頭上則露出「雪浪」兩個篆體字。於是李文耀立刻將此事報告直隸總督方觀承（1698-1768）。方觀承得報後，則一五一十把此事上報給乾隆皇帝，並且建議將此石移置到皇家花園。⁶⁰ 乾隆得知此消息後，拒絕了方觀承的提議，而是認為蘇軾的石應該放置雪浪齋，建議將此石從臨城運往定州眾春園，與之前的雪浪石放在一起，於是有了前雪浪石與後雪浪石（圖 10）。

李文耀講述的這一再發現過程，聽上去多少有誇張的成份，而且敘述模式很類似地方官上報「祥瑞」出現的模式。根據《臨城縣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長洲宋廣業確實在臨城做縣令，⁶¹ 期間他曾在臨城縣署後「修省堂」之西建「宛在軒」，並於旁植荷芰，置一石於堂前，並重新命名修省堂為「介齋」。⁶² 翻閱宋廣業的文集，《臨署雜詠十二首》中第九首為《雪浪石》：「玲瓏一拳秀，移來貯盆盎。疑是定州物，蒼巖題雪浪。齋以介為名，庭中峙尺璧。擬欲攜之歸，得毋傷清白」。⁶³ 根據此詩內容，尤其是「疑是定州物，蒼巖題雪浪」恰可知此石並非宋廣業從定州搬運至臨城。宋廣業只是覺得此石的玲瓏形狀很像蘇軾描繪的雪浪石，猜測也許是定州之雪浪石，因而囑朋友葉蒼巖題刻「雪浪」二字於石頭表面。

59 倘若此故事屬實，那麼根據康熙年間編制的《臨城縣志》，宋廣業於康熙二十一年（1681）至二十六年（1686）任臨城縣令，移石的工程當在此期間完成。（清）喬已百纂，楊寬修，《（康熙）臨城縣志》，康熙三十年（1692）刻本，卷4，頁7b，北京愛如生數字中國方志庫。

60 此前因後果參見張若靄《雪浪石圖》、張若澄《後雪浪石圖》題跋，或（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雪浪石記》，收入（清）王傑等撰，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乾隆末年內府朱格抄嘉慶增補本影印），卷46，頁294-295。

61 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康熙皇帝巡幸五臺山，宋廣業還曾事奉委龍泉關修理御路，恭迎聖駕。（清）宋廣業，《蘭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據康熙刻本），冊172，卷首，頁82。

62 （清）汪師韓，《韓門綴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間刻上湖遺集本影印），子部，冊1147，卷5，〈雪浪石〉，頁518。

63 （清）宋廣業，《蘭皋詩鈔》，卷4，〈臨署雜詠十二首之九雪浪石〉，頁107。

趙州州牧李文耀所挖之石當確為宋廣業曾置縣署後花園之觀賞石，只是除了石身上所鐫的「雪浪」二字，此石與蘇軾雪浪石之間很難再找到進一步的聯繫。但是有意思的是，李文耀所敘述之故事充滿了傳奇的色彩，此雪浪石之發現也是從地下挖出，顯然，半被掩埋、被雜草覆蓋提升了雪浪石的真實性。

（三）假故事·真歷史

兩個雪浪石，在康熙朝與乾隆朝分別出現了關於它們的一個失而復得的「再發現」的故事。雖然這兩則故事的真實性都是值得懷疑的，但是這兩則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證明石頭為蘇軾雪浪石的有利說法。雪浪石的真實性既與一般古物有相似的判斷標準，又因其媒介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正如丹尼斯·達頓（Denis Dutton）指出，對於不同媒介的藝術品，其真偽論斷也應有所區別。⁶⁴ 這提醒我們，奇石雖然在北宋已被當成可收藏的文物／藝術品，但其真實性明顯不能與書法、繪畫作品的真偽採用同樣的判斷標準。學者、鑑賞家對於書畫作品的真實性，往往通過考察作品本身的風格、收藏印章、名家題跋等，來確認其藝術水準和是否流傳有序。⁶⁵ 相比之下，石質古物往往由於缺乏收藏者（或使用者）與文物之間聯結的直接證據，很難追蹤其流傳序列，因而，金石古物的再發現的地點以及古物上的銘文則顯得尤為重要。

對再發現地點和古物上銘文的重視，體現在很多金石器物的再發現故事里。銘文從很早就可謂是較直接指示古物身份的證據，也是提升金石器物身價的重要指標。⁶⁶ 另一個常被人忽略的聯繫則是在收藏者或使用者活動的地方挖出與使用者相關的古物。這種聯繫往往被認為是可信的、可靠的。這些地方包括工作過的地方、居住過的地方、常常走訪的寺廟或園林。⁶⁷ 十八世紀在文人圈子裡出現了「東

64 繪畫作品往往有一件原件，因此判斷一幅繪畫的「真」則取決於它是否為原件，而非復制品或偽品。相比之下，對音樂作品則無法套用此標準，因為音樂表演並沒有唯一的「原件」，一切皆需看判斷者是追求樂譜的「真」，還是樂器的「真」。Denis Dutton, "Authenticity in Art," 264.

65 Marilyn Fu et al.,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Judith G. Smith and Wen C. Fong,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Jason C. Kuo, *Perspectives on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Painting* (Washington, DC: New Academia Publishing, 2008).

66 對銘文的重視也直接反映在文物市場的價格上。見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33卷1期（2015秋），頁399-441。

67 現藏於首都博物館的賈似道（1213-1275）刻本原石《宣示表》就傳為自賈似道去世後，被深埋於杭州西湖葛嶺賈似道的故居半閑堂地下。而直到清初才被寺僧從半閑堂地下挖出。因此，

坡熱」，這一個熱潮不僅延續到了十九世紀，也漫延到了朝鮮王朝的文人圈子。⁶⁸伴隨這一熱潮而來的，則是一些與東坡相關文物的再發現。嘉慶五年（1800），伊秉綬在惠州擔任知府時，曾因仰慕蘇軾而多次登白鶴峰東坡故居，不忍見其故居破損嚴重，便私掏腰包重新修葺。修葺過程中，在名為東坡洗硯池的地方意外掘得一方刻有「軾」字的硯臺，因而喜出望外。翁方綱有題記此事，「惠州守伊墨卿葺白鶴峰東坡故居，掘地得硯，背有先生書名並『德有鄰堂』小印，拓以寄予」。⁶⁹這方硯臺還有翁方綱於嘉慶六年（1801）的題硯銘：「東坡先生德有鄰之研，先生書名在，為惠州守伊公得之，蓋去先生寓此七百有五年」。此東坡硯之發現，也是一次偶然的掘地而出之文物。提及此東坡硯之發現過程並非質疑此事的真實性，而是想要強調在十八、十九世紀，學者對於石質古物真實性的確定，往往依靠的證據是：在使用者或收藏者曾經頻繁活動過的地方發現，古物上有指示使用者或古物的銘文。雖然相距蘇軾離世已過了七百多年，但是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發掘於蘇軾故居，並且硯臺上刻有「軾」字又刻有「德有鄰堂」印，則是非常可信的證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前雪浪石和後雪浪石再發現，擁有類似的故事敘述。這些故事除了增加觀賞石的傳奇色彩，很可能也成為證明它們真實性的證據。康熙年間創造的前雪浪石再發現的故事，裡面提到發現芙蓉盆和雪浪石的兩人都是在定州任職的官員，他們於任期內偶然所得，雖然並沒有提具體發現的地點，但是蘇軾當年也是到定州任官時發現此雪浪石，因而他們的活動空間會有很多重疊，比如定州官署、定州文廟等。這使得他們發現芙蓉盆與雪浪石顯得可能性較大。後雪浪石再發現的故事裡，雖然發現地點並不位於定州，但是提到是宋廣業到臨城任官時從定州運雪浪石到了臨城，而且石身上鐫刻的「雪浪」二字則直指蘇軾的雪浪石。

此《宣示表》被認為是宋代原刻而輾轉被清代、民國多位著名收藏家所遞藏，直至近年才被首都博物館以高價競拍到。見馬英豪，〈簡述館藏賈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首都博物館論叢》，2014年，頁303-311。

68 關於十八、十九世紀「東坡熱」的研究，可參見衣若芬，《書藝東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45-176、203-287；Michele Matteini, "The Aesthetics of Scholarship: Weng Fanggang and the Cult of Su Shi in Late-Eighteenth-Century Beijing," *Archive of Asian Art* 69 (April 2019): 103-120.

69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刻本影印），集部，冊1455，卷56，〈有鄰研齋稿上〉，頁184。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從定州文廟雪浪齋消失後的雪浪石，其實已很難證明其可靠來源和出處。但是在當時，從地下挖掘出的「失而復得」的故事則給雪浪石流傳中斷一個非常合理的解釋，又暗示了它來自於更早的時期，即因為它被荒廢掩埋於地下，所以仿佛進入了一個時間膠囊中。當它再被發現之時，其真實性則似乎不容質疑。

三、乾隆皇帝對前、後兩雪浪石的鑑定（1766-1796）

十八世紀最矚目的學術史發展就是考證學的興起，這也對理解古物真實性問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⁷⁰ 由於前後兩雪浪石都安置在皇帝的行宮，所以其真偽問題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視。乾隆皇帝精通儒學，其在位期間，不僅提倡與扶持考據學，使整理與考訂古典文獻的學術活動達到一個高潮。同時，他自身也具備考證學基本學術素養，對史地、圖像典籍等進行考據勘正的研究。⁷¹ 因此，他在考證兩雪浪石的真偽問題時，使用的考證的方式也主要變為實地考察及對物質的觀察，以及文本、圖像與物質的互相參照比對。乾隆皇帝不僅自己前往觀察、作詩，也不斷請宮廷畫家為雪浪石畫像、讓地方官員繪圖取證。⁷² 他前後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最終給雪浪石孰真孰偽劃下句號。這不僅給我們理解十八世紀下半葉人們對古物「真實性」認知提供了很好的個案，也讓我們看到這種認知從十八世紀上半葉到下半葉是如何發生變化的。

乾隆皇帝在還是皇子時就關注過雪浪石，但是他從來沒有懷疑過雪浪石的真偽。⁷³ 直到乾隆三十年（1766）第二塊雪浪石的出現，使得真偽問題變得迫切。

70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71 喬治忠，〈乾隆皇帝的史地考據學成就〉，《社會科學輯刊》，1992年3期，頁93-98；鈔曉鴻，〈涇渭清濁：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12期，頁177-198。

72 對於文人石這類古物的考據，歷史文獻有時會有不一致之處，甚至是錯誤，學者往往感受到有需要去創造新的文獻及視覺材料以理清歷史的記載。十八世紀末，寶晉齋研山的再發現也伴隨了一批新的視覺材料的創造，見 Michele Matteini, "The Story of a Stone: Mi Fu's Ink-Grinding Stone and its Eighteenth-Century Republications," *Arts Asiatiques* 72 (2017): 81-96.

73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樂善堂全集定本》，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內府刻本，卷18，〈雪浪石〉，頁3b，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https://id.lib.harvard.edu/alma/990080312920203941/catalog>（檢索日期：2024年11月15日）。《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的都是乾隆皇帝為皇子時期所作的詩文。

考慮到它們的再發現都是從地底下挖掘所得，乾隆皇帝開始尋找其它的線索和證據。除了利用文本材料，他還用圖像和物質材料去進行了反復的比對和考證。諷刺的是，這些看似更科學的方法，不僅彼此矛盾，也並沒有幫助乾隆皇帝得出更可靠的結論。

（一）文獻與圖像材料的矛盾

剛得知臨城發現的雪浪石後，乾隆皇帝還未來得及親睹此石，因此，他的判斷主要基於文獻和繪畫材料。乾隆皇帝於 1746 年曾囑董邦達（1699-1769）根據西巡帶回稿本繪制了兩幅衆春園的總覽圖，一為放置多寶格的袖珍手卷，一為立軸，其中雖都有雪浪石身影，但其在全景圖中被畫得較為簡單抽象（圖 12、13）。也許正因為如此，乾隆皇帝特地派他喜歡的詞臣畫家張若靄（1713-1746）親自前往衆春園，繪制康熙年間被移入園內的前雪浪石像（圖 14），但繪制完成後不久張若靄就因病去世。⁷⁴ 因此，二十年後繪制後雪浪石的任務，則指派給了張若靄的弟弟，同是詞臣畫家的張若澄（1721-1770）。⁷⁵ 張若澄前往考察新掘出的雪浪石，並「繪其狀以歸」（圖 1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記錄顯示，乾隆皇帝幾乎是一拿到張若澄繪制的臨城雪浪石畫稿，就開始著手進行考據。並且傾向於認為臨城的雪浪石為真，但是又覺得證據不是很確鑿。乾隆皇帝在農曆三月四日寫下了「雪浪石記」。三月二十三日，如意館收到「御筆箋紙雪浪石記字一張」、「御筆雪浪石記手卷一卷」，⁷⁶ 至遲到四月初七日，張若澄完成的畫作交到如意館，與其兄長張若靄畫的《雪浪石圖》照同樣的方式裝裱。⁷⁷ 乾隆皇帝的「御制雪浪石記」也被于敏中（1714-1779）謄寫在張若澄《後雪浪石圖》的左上方。乾隆皇帝在「御制雪浪石記」中考證了一番，他說：「既考《墨莊漫錄》稱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

74 張若靄是三朝重臣張廷玉（1672-1755）的大兒子，1745 年擢昇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於 1746 年派張若靄去繪制前雪浪石，是因為乾隆同年西巡雖經過定州，但未及進入眾春園一睹此石風采。

75 乾隆皇帝因此事還賦詩一首〈命張若澄圖雪浪石，至詩以志事〉，收入《御制詩三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嘉慶武英殿刻本影印），冊 323，卷 56，頁 299。

76 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卷 30，頁 89。

77 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卷 30，頁 90。

微所畫，石間奔流云云。則茲得之臨城者又實似之，而向之定州所置者，實不似焉」。⁷⁸《墨莊漫錄》為宋代張邦基（約 1131 前後）所作，乾隆皇帝選擇這則材料，很可能是因為張邦基所生活的年代接近蘇軾所生活的年代，理論上他更有可能見過最初的那塊雪浪石。有趣的是，倘若我們根據《墨莊漫錄》中所言雪浪石為「黑石白脈」，那麼看過兩張石頭照片的話（圖 7、11），我們都會得出跟乾隆皇帝相反的結論，即定州衆春園的才是有白色紋理的黑色的石頭，而臨城的石頭則明顯是白色的太湖石。那麼乾隆皇帝為何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呢？

乾隆的判斷很可能是根據兩幅雪浪石的繪畫作品來比較後得出的相似與不似的結論，而兩幅畫作本身，尤其在顏色的表達上，都存在一定的誤導性。張若靄看到的前雪浪石本身是黑石白脈，但是他對石頭的描繪用大塊面積的白色去營造雪浪和雲霧的氛圍（圖 14）。對比之下，張若澄看到的後雪浪石是白色的玲瓏石，屬太湖石類，因天然多竅而得名，可是他畫的時候用了大量的墨色去營造溝壑的陰影明暗，就把一塊白石畫得像黑白相間（圖 15）。這種藝術表達帶來的誤導，特別明顯地體現在詞臣畫家錢維城（1720-1772）《畫雪浪石並書乾隆帝雪浪石記》的描繪中。此幅畫應為乾隆皇帝初步考證完後，命錢維城並繪兩石，且附以蘇軾書風謄抄的《御制雪浪石記》以記緣起。⁷⁹很顯然，錢維城並沒有見過兩塊雪浪石，因此，兩石的形象應該是依照張若靄和張若澄的畫作所繪。那麼錢維城基於畫作的再理解和再表達，更加強了前雪浪石是塊白色石頭，而後雪浪石是「黑質白章」這一印象（圖 16）。而這一表現方式明顯與兩塊石頭的真實顏色相違背。

乾隆皇帝當然也並非全依賴視覺材料。他認為蘇軾的石頭應該根據蘇軾的詩來進行判斷，因此蘇軾的詩也成為他考據的主要文本材料，並且提出蘇軾的詩似乎更加支持前雪浪石為真。因為蘇軾的詩中提到「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炮驚落天驕魂」和「異哉炮石雪浪翻」。⁸⁰「飛石」、「炮石」都是古代戰守的一種工具。「飛石」是指置石於大木之上，發機以擊敵。「炮石」是用炮拋射的石頭，因此就是說

78（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雪浪石記〉，收入（清）王傑等撰，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卷 46，頁 294。

79（清）錢維城，《茶山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眉壽堂刻本影印），冊 346，卷 10「書後」，〈御制雪浪石記恭跋〉，頁 689。

80（宋）蘇軾，〈次韻滕大夫三首其一·雪浪石〉，收入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888。

此石的體積不會太大。而臨城挖出來的石頭「高且盈丈」，體積稍為龐大，不可能拿來做炮石。最後，乾隆實在得不出孰真孰偽的結論，則言：「夫東坡去今六百餘年，風流太守，一時遣興攤詞，即瓦礫可為珠玉，而必爭是非真偽於此時，是不大可笑哉？」，所以乾隆皇帝歸結於實在無法從蘇軾自己的文字中得到線索，因為文學作品有時候並不寫實，「瓦礫」也可被描述成「珠玉」，因此只要在此中體味蘇軾的風流就好，錙銖必較真偽問題則顯得太為可笑。然而，他明顯並沒有從心中擱下此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底，乾隆皇帝再次下令時任直隸總督的袁守侗（1723-1783）查明眾春園內新舊兩雪浪石之原委，並且繪具新舊兩石圖樣，惜圖樣已無存。⁸¹至此，文獻資料與圖像資料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二）「文質」之辯——乾隆皇帝的鑑定理論？

直到乾隆皇帝得以親自觀察這兩塊雪浪石，他才將考察重點從文獻、圖像資料，轉移到了兩塊石頭本身。然而，這似乎也沒有對真偽的判斷給予太多的幫助。乾隆皇帝得到眾春園觀看雪浪石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十二日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兩次西巡五臺山。這兩次西巡，乾隆皇帝都途經定州、駐蹕在定州眾春園。通過這兩次的瞻仰，乾隆皇帝留下大量關於雪浪石的詩作，其中有：

雪浪齋前兩卷石，一臥一立誰主賓。
其間是非率難辨，可知今昔胥幻塵。⁸²

片石頗具奔流狀，況鐫兩字留雲根。
我為解嘲乃並置，不必求劍舟刻痕。
兩張一董跡並棄，其間是非無定論。⁸³

不逢白鶴訪子孫，兩卷石竟孰是原。
其一刻識一無識，誰能志乘研詳翻。⁸⁴

81（清）袁守侗，〈奏為查明定州眾春園內雪浪石之原委仰祈聖鑒事（附奏片）〉，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一日，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檔折件：故機 029241。

82（清）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辛丑仲春〉，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首。

83（清）愛新覺羅·弘曆，〈乾隆辛丑仲春下浣題雪浪石七疊前韻〉，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首。

84（清）愛新覺羅·弘曆，〈乾隆丙午春三月三疊東坡刻盆詩韻〉，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首。

從詩句「其間是非率難辨」、「其間是非無定論」看出，乾隆皇帝仍然無法定奪孰真孰偽，但是他還是更傾向於認為後雪浪石是真的，因為他在詩句「片石頗具奔流狀，沉鐫兩字留雲根」和「其一刻識一無識」裡，強調後雪浪石不僅形態更有「雪浪」的奔流之狀，而且石上有篆書刻「雪浪」二字。這鐫刻的「雪浪」二字似乎成為指明石頭身份的有利證據。因此，這幾首詩中，乾隆皇帝也沒有再提起雪浪石的顏色特徵，因為相比之下，前雪浪石更符合「黑質白章」，而這與乾隆皇帝所傾向的判斷相左。

有趣的是，這一懸案，卻在六年後（1792）徹底翻了案。這一次，乾隆認為前雪浪石才是真的，而後雪浪石是假的。翻案的契機是乾隆皇帝第六次西巡途經定州又再次駐蹕衆春園，在芙蓉盆上找到了突破點。學者們曾對乾隆皇帝的藝術鑑賞水平做過研究，雖然他對不同類型的藝術品的鑑賞水平並不相同，但是乾隆皇帝非常愛學習而且精力旺盛，整體上他的鑑賞水平是一直在提高。⁸⁵推翻自己之前對古物、書畫的鑑定，也並非第一次。⁸⁶對於兩塊雪浪石，乾隆在駐蹕衆春園時再次賦詩幾首強調自己的新發現：

在蘇言蘇卻在石，兩石並為留遺痕。然吾究謂磐者實，以坡之跡定其論。坡跡七字孫其韻，手書之泐磐石盆。實證在茲不煩絮，久乃論定千秋存。⁸⁷

石固有二盆則一，卻成三不妨案翻。……兄寫磐臥弟片豎，而其臥者恆占盆。豎者乃有蘇字在，輟然笑艱尋其根。⁸⁸

自從 1781 年始，乾隆則稱前雪浪石為「磐石」、「炮石」或「臥石」，而稱從臨

85 Nicole T.C. Chiang, *Emperor Qianlong's Hidden Treasures: Reconsider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13; Kohara Hironobu, "The Qianlong Emperor's Skill in the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Painting," in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Symposium Papers*, ed.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Tempe, AZ: Art History Faculty, School of Art, College of Fine Art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8-1991), 56-73.

86 其中一則例子是倪瓚款《獅子林圖》，從乾隆二十二年始（1757）乾隆皇帝一直以為此圖卷為倪瓚真跡，並且描繪的園林為倪瓚別業。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最後一次南巡，乾隆才意識到自己一直搞錯了獅子林的源流，並寫考證文更正自己的訛誤於畫卷之後。見趙琰哲，《茹古涵今——清乾隆朝做古繪畫研究》（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6），頁 85-102。

87（清）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壬子清和雪浪石八疊蘇東坡韻〉，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首。

88（清）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壬子孟夏月四疊東坡刻盆石詩韻〉，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首。

城運來的後雪浪石為「豎石」或「片石」。根據上述兩則材料，乾隆斷定「磬者實」，即是認為前雪浪石為真，而從臨城運來的後雪浪石為偽。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乾隆判斷真偽的關注點轉向了芙蓉盆。兩首詩都提到了芙蓉盆上鐫刻有蘇軾的書跡《雪浪齋銘》，這在較早文獻都有提到，而只有前雪浪石一直被盛載於芙蓉盆內。後雪浪石並沒有盛載它的芙蓉盆，雖然它石身上有刻「雪浪」二字，可是文獻材料裡卻從來沒有記載過。乾隆皇帝因此認為雖然雪浪石有兩個，但是雪浪盆只有一個，⁸⁹ 那麼當然是一直坐落在雪浪盆裡的雪浪石才是真正的雪浪石。⁹⁰

為了給這一真假雪浪石徹底蓋棺定論，乾隆皇帝又作「雪浪石後記」，從中可見他的理論支撐和依據：

丙寅始見雪浪石無字者，圖且歌之。越二十年丙戌，再見有字者，亦圖且記之，迄未定其真贋也。又越二十六年，壬子西巡過中山，摩挲兩石。作而曰：天下有定者質也，無定者文也。而古人動以金石文字為可據。以為可據而文之，即懼人以為不可據而亦文之。岫巖之字、延陵之碑、嶧山之刻石，尚可輾轉傳摹，況區區六百餘年之兩篆哉。……文可造，質不可變。固宜定以無字者為真，有字者為贋也。……此盆既有蘇詩，應以為真。⁹¹

這則「雪浪石後記」裡，乾隆皇帝用了儒家討論中一個經典的「文質」之辯去解釋自己區別真偽的依據。「文質」之辯出自《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指本質，內在的；「文」指文飾或外在表現。在儒家討論裡，這一議題主要用來討論人的德性或用來分析歷史演替的。最初「文」與「質」並無高下之分，而是相互彌補、相互損益。

在乾隆皇帝的語境裡，「文」則主要是指刻在後雪浪石上的字，而「質」則

89 根據汪師韓的記錄，後雪浪石「惟因石上有篆書『雪浪』二字，當事蹤跡得之，役騾馬八十頭，輦還定州，其石頗大，盆不能容」和錢維城畫作中對後雪浪石的描繪，它剛從臨城運往定州上時，應該是沒有石盆盛載的，但是後來搬入眾春園後，有官吏又做了一個石盆以盛後雪浪石。

90 其實後雪浪石應也盛放於一個石盆中，只是此石盆盆口緣應該並沒有刻《雪浪齋銘》。因為乾隆皇帝翻案後，又命大臣董誥將〈雪浪石後記〉書於張若靄《雪浪石圖》中部左側和張若澄《後雪浪石圖》中部右側，但是其中「此盆既有蘇詩，應以為真」這一句，謄寫於張若澄的《後雪浪石圖》上時則改為「此盆乃疆吏補為者，命斥去，應以為贋。」

91 乾隆皇帝之〈雪浪石後記〉，由董誥小字敬書於張若靄《雪浪石圖》中部左側，同時此〈雪浪石後記〉也讓董誥書寫於張若澄《雪浪石圖》中部右側，唯獨「此盆既有蘇詩，應以為真」句換成「此盆乃疆吏補為者，命斥去，應以為贋」。

指的是石頭本身。因此，乾隆皇帝判斷後雪浪石上的「雪浪」二字應為後來者偽造，「文可造，質不可變」則指出「雪浪」二字可以被後人鐫刻上去，而石頭本身並不是蘇軾的雪浪石，因此，沒有刻字的前雪浪石應定為真雪浪石，而有刻字的後雪浪石應為贗品。表面看上去，乾隆皇帝通過「質勝於文」展現了對物質材料本身的重視，削弱了文字所帶來的光環。事實卻並非如此，甚至與乾隆皇帝的理論相悖。

前面已經指出，乾隆皇帝最終認定前雪浪石為真，主要原因是它有芙蓉盆，而「此盆既有蘇詩，應以為真」。那麼，似乎乾隆皇帝判斷的標準還是更注重「文」而非「質」。雖然「文質」之辯在歷來不同的學者、士人中有不同的解釋，而且語義複雜，但是根據楊念群的研究，在清初由「文」返「質」就成為一股主流的思潮，而到清中葉，「文質之辯」很少僅停留在單純的學術討論，而是與清帝「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建構有密切關係。⁹² 因此乾隆皇帝引用的「文質」之辯更像是一種政治話語，而實際上乾隆皇帝對真實性的判斷更多地還是來自於對銘文的重視。原來憑著後雪浪石上鐫刻的「雪浪」二字偏向後雪浪石為真，後來則根據芙蓉盆上的銘文認定前雪浪石為真，其實本質上還是對銘文的信賴，而非從兩塊雪浪石本身物理特性上去考量。

四、被質疑的芙蓉盆——十九世紀的懷疑精神

乾隆朝之後，還不斷有學者討論前、後兩雪浪石的真偽。雖然他們在觀點上與乾隆皇帝最終的判斷無二致，即後雪浪石為偽造，但是他們更多地言偽不言真，切入點也更偏重從雪浪石的物理特性著手考證。

斌良（1771-1847），字吉甫，滿洲正紅旗瓜爾佳氏，也曾入衆春園觀雪浪石並拜韓蘇祠。他在詩中寫道「準以蘇句辨真偽，臨城輦送姑無論」。⁹³ 因此，他認為蘇軾的石還應以蘇軾的詩來作判斷依據，方法是通過文獻材料與雪浪石的物理特

92 楊念群，〈從「文質」之辯看清初帝王與士林思想的趨同與合流〉，《清史研究》，2008年2期，頁1-36；楊念群，〈「文質」之辯與中國歷史觀之構造〉，《史林》，2009年5期，頁82-90。

93（清）斌良，〈雪浪石韻〉，《抱衡齋詩集》，卷36，頁5b，光緒五年（1879）崇福重校刊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s://id.lib.harvard.edu/alma/990072976540203941/catalog>（檢索日期：2024年11月15日）

性相比對。斌良提出了兩點，第一是後雪浪石的大小與蘇軾的詩描述不符，這一點乾隆皇帝也提過，即蘇軾描述的雪浪石可作炮石，因此，體積不會太大，而後雪浪石高丈餘。第二是顏色，《墨莊漫錄》中記載蘇軾的雪浪石為「黑石白脈」而後雪浪石是純青灰色，並非黑石。最後一點，他引用定州知州寶琳（1800-1860）的看法，認為後雪浪石從石頭種類上看應屬趙州玲瓏石。⁹⁴ 玲瓏石屬太湖石種，因此也非蘇軾所言的雪浪石。綜上所述，後雪浪石則為偽託無疑。雖然嘉慶皇帝還瞻仰過兩雪浪石並為其作詩，但是到道光年間，基本大家都確定後雪浪石為偽。收錄在道光年間重修的《直隸定州志》中的衆春園總覽圖，也刻意只畫了一個雪浪石，從形態上可以明顯判斷是前雪浪石（圖 17），似乎關於後雪浪石的故事無人再願提起。

學者們對於後雪浪石為偽基本達成共識，但是他們也並沒有急於認定前雪浪石為真，甚至也開始懷疑起芙蓉盆的真實性。乾隆皇帝最終判斷前雪浪石為真的一個核心就是前雪浪石置於芙蓉盆內，而芙蓉盆刻有蘇軾的《雪浪齋銘》。可是根據上一節的分析，我們知道芙蓉盆於 1609-1610 年間至少被重刻或重換過一次，而根據楊沂孫（1813-1881）在「雪浪石盆銘」拓本上的題跋（圖 18），「乾隆中葉盆無恙，忽有內監入祇園。少見多怪叱磨去，僧俗承意不敢言」，似乎乾隆年間芙蓉盆上的刻字又被人為磨掉過一次。因此，芙蓉盆是否為原件開始成為一些官員學者討論與懷疑的重點。

杜堦（1764-1859），山東濱州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他曾去衆春園看過雪浪石，並賦詩一首，雖然從中他得出「前者疑真後疑假」的判斷，但是其中「雨淋日炙歲八百，齋已非是況於盆」一句則似乎也對芙蓉盆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⁹⁵ 這裡的雪浪齋指的是韓逢庥於衆春園新建的雪浪齋，因此杜堦指出：連雪

94 寶琳，字夢蓮，是滿洲鑲黃旗人。他之所以知道後雪浪石屬趙州玲瓏石，也許因為他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在趙州任知州，一年後由趙州知州調任定州直隸州知州。關於寶琳的官宦經歷，參考賈國鎮編，《趙州名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314-316 頁。勞沅恩也提到過寶琳對此石的判斷，說：「夢蓮刺史謂即唐空明石，本在趙州，移置於此」，出自（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 22，「藝文 古今人詩」，頁 78b。夢蓮刺史即為寶琳，雖然這裡說後雪浪石為空明石，但據明朝隆慶《趙州志》載：趙州公廨內有石嶙峋奇怪，孔竅相通，石上刻有「空明洞天」四字，疑是晉唐物，但久已無存。

95 （清）杜堦，《遂初草廬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杜受廉刻本影印），集部，冊 1498，卷 4，〈觀東坡雪浪石用元韻〉，頁 525。

浪齋都不是蘇軾於文廟後建的雪浪齋，更何況是芙蓉盆呢？勞沅恩（1802-1858）在為道光年間定州知州寶琳（1800-1860）重修眾春園、韓蘇祠和雪浪齋歌頌功績時，提到「再出人間四百載，觀者於是群猜疑。盆如雪瓷銘完好，尤恐刻鏤非宋時」。⁹⁶勞沅恩認為雪浪石、芙蓉盆再現人間是可疑的，尤其是芙蓉盆如瓷器一般嶄新完好，恐怕盆上的銘文早已非宋時的原刻。

還有學者從書法風格的角度討論「雪浪石盆銘」。著名書法家、學者何紹基（1799-1873）於定州行宮細讀「雪浪石盆銘」後也說「惜哉銘字傷嫵媚，不模不範失本根」。⁹⁷一件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的「雪浪石盆銘」拓片上，收藏者的跋文提到這件拓本是他來自定州的兩位表兄王戎、李翰臣於同治元年（1862）贈予他收藏的。光緒十年（1884）他將此拓片從篋中取出在琉璃廠重新裝裱，其中一冊頁上他題寫「定州雪浪盆銘五十六字，世傳坡翁書，然玩其筆意，與蘇書絕不相類，不知何故，或者其盆久佚，此乃後人所做造耶？」⁹⁸

無論是從新舊程度，還是從書法風格，文人學者們都認為此芙蓉盆，或者至少是刻於芙蓉盆的「雪浪石盆銘」為後人做造。這樣的認知不僅與乾隆皇帝依賴於銘文來證真所不同，更是與十八世紀以前對真實性的認識大相逕庭。

在十九世紀，人們明顯更加關心芙蓉盆上的銘文是否為原刻，以及芙蓉盆本身是否為原盆。所有的文人學者所擔心都是這也許是「後人所做造」。而對比十七世紀的袁中道，他在意識到芙蓉盆上銘文為新刻時，並不認為其為做造或偽造，而是認為清晰、還未被摹拓的銘文完整地保存了蘇軾書法的精髓。這前後認知的差異，並非輕信與懷疑精神的對立，而是僅僅在這二百多年間，人們對「真實性」的判斷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從雪浪石的個案，我們可以看出古物的「真偽」判斷對於生活在前現代的人們來說，並非總是那麼迫切。十八世紀以前，「真正的」雪浪石、芙蓉盆可以有多個，無論是蘇軾當年所收藏的原石，還是後來被替換的石頭、石盆（或新鑄銘

96 勞沅恩，〈寶夢蓮刺史重修眾春園韓蘇祠并葺雪浪齋指石屬題成二十韻〉，收入（清）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22「藝文」之「古今人詩」，頁78b。

97 （清）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影印），集部，冊1528，卷11，〈定州行宮觀雪浪盆恭讀〉，頁671。

98 「雪浪石盆銘」明刻墨拓本，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金石拓片資料庫，書號：金1248。

文)，它們在「景」的層面上都是真的。十八世紀「再發現」的兩塊雪浪石因缺乏了「景」的依託，則有了從地下挖出這一「失而復得」的故事敘述作為解釋其流傳中斷、支撐其真實性的依託。對雪浪石真偽判斷的迫切感源於第二塊雪浪石的發現。此時兩塊石頭都放置於清朝皇帝位於定州的衆春園行宮中，因此，十八世紀下半葉，乾隆皇帝結合文本材料、圖像材料和實地考察，通過多次思考和考證，表面上用「文質之辯」話語推翻並更正了自己早期的判斷，實則這種「真實性」依舊是仰賴金石器物上銘文的光環。而十九世紀的觀賞者雖然也最關注銘文，但是他們一再指出銘文非原刻，同時他們也很關注石頭的物理特性，因而，最終因銘文不是原刻而認為芙蓉盆與雪浪石都不再是當年蘇軾所藏。這樣的理解其實已經很接近我們現代概念上的「真」。有意思的是，雪浪盆銘非原刻，卻不影響金石古物愛好者們樂此不疲地收藏雪浪盆銘的各種拓本，甚至拓本直徑都大小不一、相距甚遠，而這其中體現的復制品與真實性的關係，則是另一個議題了。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張舜民，《畫墁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103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93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郝經，《陵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119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納新，《河朔訪古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 59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元)劉因，《靜修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11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明)范正脈，《龍圖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據清咸豐四年（1854）刻本。
- (明)都穆，《使西日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127，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刻本影印。
- (明)袁中道，《珂雪齋近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刻本影印。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74，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崇禎二年（1629）武林佩蘭居刻本影印。
- (明)張鼎，《寶日堂初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影印。
- (明)張璧，《陽峯家藏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66，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恩堂刻本影印。
- (明)葉盛，《菴竹堂碑目》，清咸豐四年（1854）南海伍氏刊本，愛如生中國金石庫。
- (明)董文驥，《微泉閣詩集》，武進董元起校刊本（1687 年出版），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 (明)蔡懋昭編纂，《（隆慶）趙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 6，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刻本影印。
- (明)鄭鄮，《峯陽草堂詩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2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活字印本影印。
- (明)魯鐸，《魯文恪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74，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明隆慶元年（1567）方梁刻本影印。

- (明) 薛岡，《天爵堂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部，輯 6 冊 25，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間刻本影印。
- (明) 韓上桂，《蘊廬稿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78，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天啓間刻本影印。
- (清)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69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影印。
- (清) 王傑等撰，故宮博物院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據乾隆末年內府朱格抄嘉慶增補本。
- (清) 汪師韓，《韓門綴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1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間刻上湖遺集本影印。
- (清) 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5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影印。
- (清) 杜堯，《遂初草廬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4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杜受廉刻本影印。
- (清) 杜濬，《湄湖吟》，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部，輯 7 冊 22，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清康熙間刻本影印。
- (清) 余縉，《大觀堂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集部，輯 9 冊 6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影印。
- (清) 宋廣業《蘭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據康熙刻本影印。
- (清) 周容，《春酒堂詩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四明張氏約園刊四明業書本影印。
- (清)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4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刻本影印。
- (清) 袁守侗《奏為查明定州衆春園內雪浪石之原委仰祈聖鑑事（附奏片）》，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一日，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檔折件：故機 029241。
- (清) 梁清標，《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204，濟南：齊魯書社，1997，據清康熙十七年（1678）梁允植刻本影印。
- (清) 喬已百纂、楊寬修，《（康熙）臨城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據清康熙三十年（1692）刻本影印。
- (清) 愛新覺羅·弘曆，《御制詩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嘉慶武英殿刻本影印。

(清)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冊 87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清)錢維城,《茶山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眉壽堂刻本影印。

近代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水賁佑,〈蘇軾雪浪齋銘刻石考〉,《崑崙堂》,2018 第 3 期,頁 12-22。

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33 卷 1 期,2015 年秋季,頁 399-441。

衣若芬,《書藝東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河北省正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正定縣志》,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2。

定州市旅游文物局編,《定州碑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孟暉,〈雪浪齋裡的瀑聲〉,《繽紛》2010 年 9 期,頁 156-157。

馬英豪,〈簡述館藏賈似道刻本原石「宣示表」〉,《首都博物館論叢》,2014 年,頁 303-311。

郭果六,〈雪浪石的故事〉,《故宮文物月刊》,26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04-111。

郭聲波,《宋朝官方文化機構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陳瑞楓,《中華古奇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常建華,〈長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討〉,《社會科學》,2011 年 5 期,頁 134-146。

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鏞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馮春江,〈「雪浪石圖」與雪浪石〉,《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 年 3 期,頁 45-49。

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喬治忠,〈乾隆皇帝的史地考據學成就〉,《社會科學輯刊》,1992 年 3 期,頁 93-98。

鈔曉鴻,〈涇渭清濁: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5 年 12 期,頁 177-198。

楊念群,〈從「文質」之辯看清初帝王與士林思想的趨同與合流〉,《清史研究》,2008 第 2 期,頁 1-36。

楊念群,〈「文質」之辯與中國歷史觀之構造〉,《史林》,2009 年 5 期,頁 82-90。

賈國鎖,《趙州名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

趙琰哲,《茹古涵今——清乾隆朝倣古繪畫研究》,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6。

- Chiang, Nicole T.C. *Emperor Qianlong's Hidden Treasures: Reconsider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 Dutton, Denis Dutton. "Authenticity in Ar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 edited by Jerrold Levinson, 258-2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Egan, Ronald C.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Elman, Benjami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 Fong, Wen C. "The Orthodox Line of Tao." In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edited by Wen C. Fong and James C. Y. Watt, 257-259.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 Fu, Marilyn and Fu Shen.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Hay, Jonathan. "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 Calligraphy, Writing, 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ang, 311-3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5.
- Hironobu, Kohara. "The Qianlong Emperor's Skill in the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Painting." In *Chinese Painting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Symposium Papers*, edited by Ju-hsi Chou and Claudia Brown, 56-73. Tempe, AZ: Art History Faculty, School of Art, College of Fine Art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8-1991.
- Jones, Mark. "Introduction: Do Fakes Matter?" In *Why Fakes Matter: Essays on Problems of Authenticity*, edited by Mark Jones, 7-12.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 Kelly, Thomas. *The Inscription of Thing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
- Kuo, Jason C. *Perspectives on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Painting*. Washington, DC: New Academia Publishing, 2008.
- Matteini, Michele. "The Aesthetics of Scholarship: Weng Fanggang and the Cult of Su Shi in Late-Eighteenth-Century Beijing." *Archive of Asian Art* 69, no. 1 (April 2019): 103-120.
- Matteini, Michele. "The Story of a Stone: Mi Fu's Ink-Grinding Stone and its Eighteenth-Century Republications." *Arts Asiatiques* 72 (2017): pp. 81-96.
- Nagel, Alexander and Christopher S. Wood. "Towards a New Model of Renaissance Anachronism." *The Art Bulletin* 87, no. 3 (September 2005): 403-415.

Smith, Judith G. and Wen C. Fong.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Zeitlin, Judith. "The Petrified Heart: Obs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t and Medicine."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12, no. 1 (June 1991): 1-26.

網路資料

- (清) 斌良,《抱衡齋詩集》,光緒五年(1879)崇福重校刊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s://id.lib.harvard.edu/alma/990072976540203941/catalog>, 檢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 (清) 董誥、曹振鏞、英和等撰修,《西巡盛典》,清嘉慶十七年(1812)武英殿聚珍版印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s://id.lib.harvard.edu/alma/990080859030203941/catalog>, 檢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 (清) 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定本》,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內府刻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https://id.lib.harvard.edu/alma/990080312920203941/catalog>, 檢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 (清) 魏權、王大年纂,《直隸定州志》,乾隆元年(1736)刻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id.lib.harvard.edu/alma/990080625780203941/catalog>, 檢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 (清) 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https://id.lib.harvard.edu/alma/990079943580203941/catalog>, 檢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圖版出處

- 圖 1 「定州文廟圖」。收入寶琳、勞沅恩編，《(道光)直隸定州志》卷十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刊本，哈佛圖書館藏。
- 圖 2 雪浪齋石碑。定州石刻館藏，定州文保所高雲波於 2024 年 11 月攝。
- 圖 3 雪浪齋石碑拓片，182×98.5 公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 圖 4 王維竹石碑之一，110×90 公分。定州石刻館藏，定州文保所高雲波攝。
- 圖 5 王維竹石碑拓片。收入定州旅游文化局編，《定州碑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 133。
- 圖 6 「定州州學圖」。收入魏權、王大年編《直隸定州志》，乾隆元年(1736)出版，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 圖 7 雪浪石(前雪浪石)和芙蓉盆，石高 76 公分，寬 40 公分；芙蓉盆直徑 136 公分，高 68 公分。藏於定州武警醫院內。俞瑩攝於 2023 年 3 月。
- 圖 8 刻于芙蓉盆盆沿的《雪浪齋銘》局部。俞瑩攝於 2023 年 3 月。
- 圖 9 「定州州城圖」。收入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五。
- 圖 10 「衆春園圖」。收入董誥、曹振鏞、英和等撰修，《西巡盛典》，卷十六「程途」，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武英殿聚珍版印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 圖 11 後雪浪石。藏於定州武警醫院內，俞瑩攝於 2023 年 3 月。
- 圖 12 董邦達，《御製雪浪石詩》立軸(局部)，1746 年，紙本設色，190.4×122.3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003120。
- 圖 13 董邦達，《御製雪浪石詩》卷(局部)，1746 年，紙本設色，16×38 公分(本幅)，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003849。
- 圖 14 張若靄，《雪浪石圖》立軸，1746 年，紙本淡設色，184.5×98.3 公分。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
- 圖 15 張若澄，《後雪浪石圖》立軸，1766 年，紙本墨筆，183.4×93.1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003027。
- 圖 16 錢維城，《畫雪浪石并書乾隆帝雪浪石記》(局部)，手卷，紙本墨筆，29.7×201.3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7 「衆春園圖」，收入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五。
- 圖 18 雪浪石盆銘，墨本拓片，直徑 186.5 公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Authenticity in Flux: A Case Study of Su Shi's Snowy Wave Stone*

Gillian Yanzhuang Zhang**

Abstract

The Snowy Wave stone is believed to be the only extant stone collected by Su Shi (1037-1101), but the debate over its authenticity has long been contentious. However, no one has questioned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judge the authenticity of stones according to modern definitions and whether the perception of authenticity itself has changed over time.

This study,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exts, images, an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stone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aims to point out that the issue of authenticity is much broader than simply rooting out forgeries. The perception of authenticity itself has also changed over time. Befo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erceived authenticity of the Snowy Wave stone came from its historical site rather than from the stone itself. The stone could be repaired or replaced and this would not impact its authenticity, demonstrating a loose bond with the original stone. After removal from its historical site, the Snowy Wave stone(s) had to prove their authenticity with a reliable origin when they reappeared in public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ich was made convincing through lost-and-found stories. Due to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nowy Wave stones, the Qianlong emperor researched for over twenty years to determine which one was authentic. Although he ostensibly turned to visual and material evidence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s as supplements to textual authority, his notion of authenticity primarily came from inscriptions engraved on the stones rather than the nature of the stones themselves. B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ervasive skepticism among the elite made them believe that a concret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ones' authenticity was impossible.

Keywords: Qianlong emperor, High Qing, authenticity, inscriptions, cult of Su Shi, evidential scholarship, intellectual history

* Received: 5 March 2024; Accepted: 8 August 2024

** Research Associate, Harvard FAS CAML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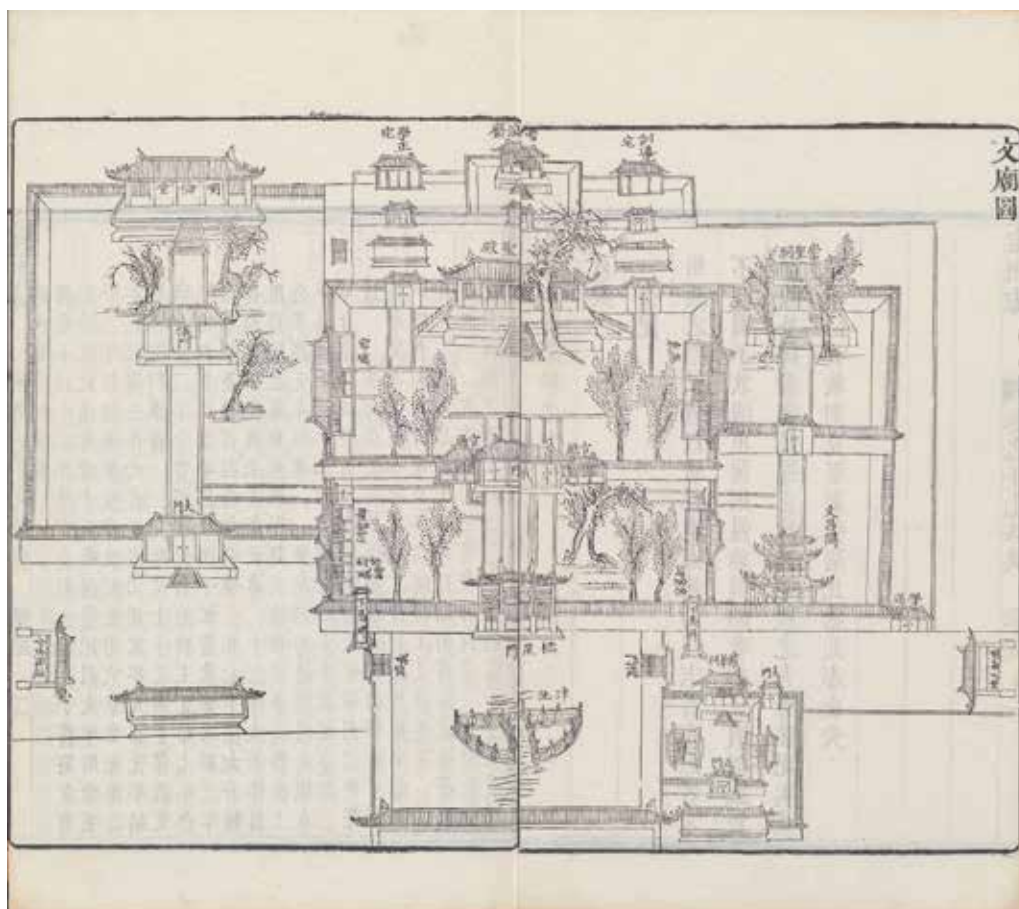


圖1 「定州文廟圖」，出自(清)寶琳、勞沅恩編，《(道光)直隸定州志》卷十七，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哈佛大學圖書館藏。雪浪齋位於文廟後面，而雪浪石當時應置於雪浪齋前。



圖2 雪浪齋石碑，藏於定州石刻館內。
定州文保所高雲波於2024年11月攝。



圖3 雪浪齋石碑拓片 182×98.5公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4 王維竹石碑之一，110×90公分，藏於
定州石刻館內。定州文保所高雲波攝。



圖5 王維竹石碑拓片，出自定州旅游文化局編，
《定州碑刻》，文物出版社，13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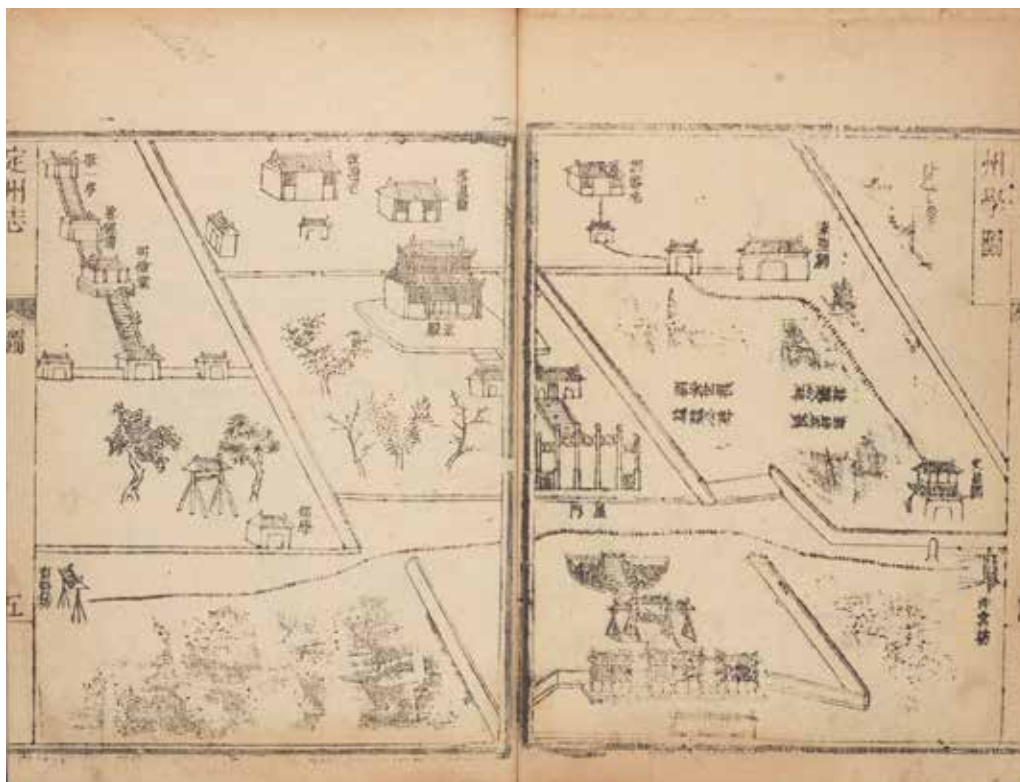


圖6 「（定州）州學圖」，出自魏權、王大年編《直隸定州志》，乾隆元年（1736）出版。
與圖1「定州文廟圖」相比，基本就是一模一樣，因為州學與文廟就是同一建築群。



圖 7 雪浪石（前雪浪石）和芙蓉盆，石高 76 公分，寬 40 公分；芙蓉盆直徑 136 公分，高 68 公分。藏於定州武警醫院內。俞瑩攝於 2023 年 3 月。



圖 8 刻于芙蓉盆盆沿的《雪浪齋銘》局部。俞瑩攝於 2023 年 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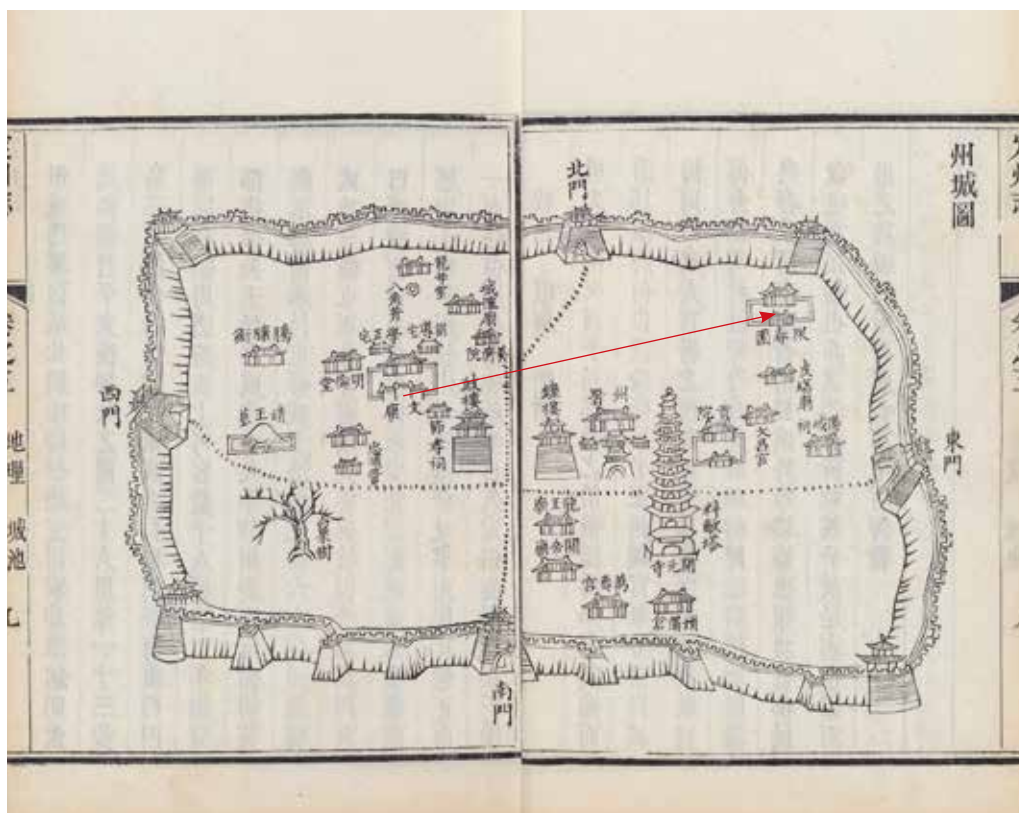


圖9 「定州州城圖」，出自寶琳、勞沅思編《直隸定州志》卷五。箭頭標注的是康熙年間定州知州韓逢庥將雪浪石和芙蓉盆移入了眾春園，脫離了它們原來所在的文廟州學的建築群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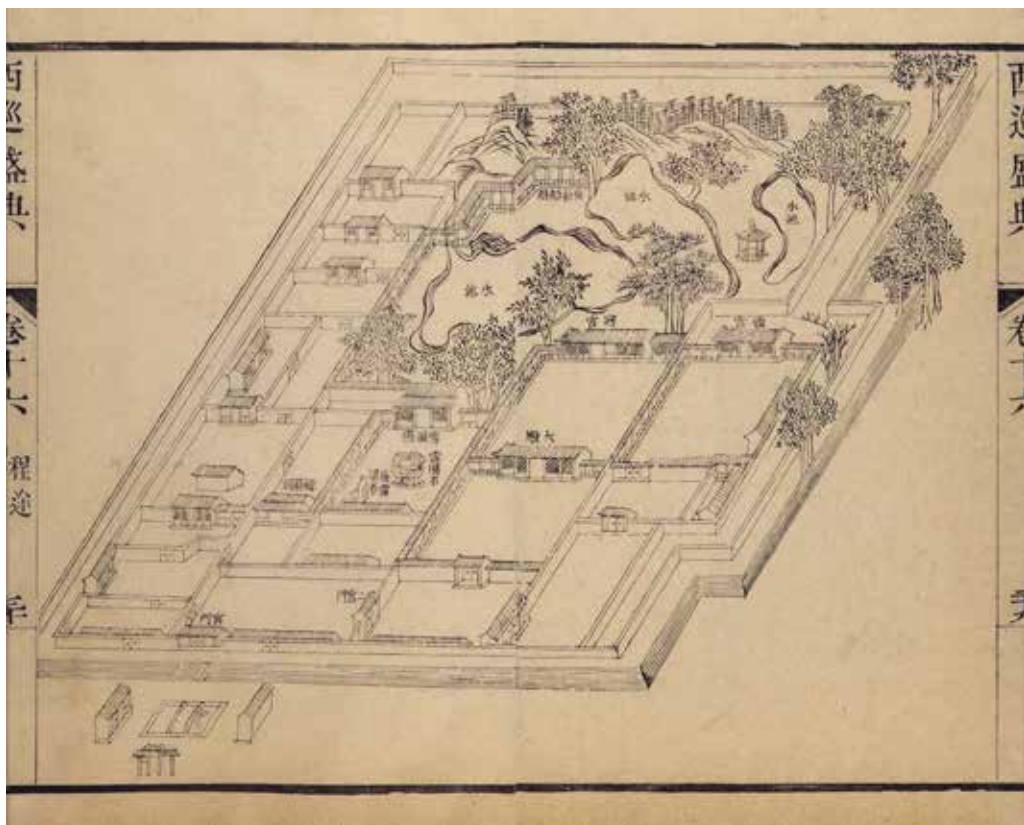


圖 10 「眾春園圖」，出自董誥、曹振鏞、英和等撰修《西巡盛典》卷十六「程途」，清嘉慶十七年（1812）武英殿聚珍版印本。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新建於眾春園內的雪浪齋（後雪浪齋），以及雪浪石和後雪浪石都被置於後雪浪齋前。



圖 11 後雪浪石，高 300 公分，寬 200 公分。玲瓏多竅，上銳下鈍，右上部鐫有篆書「雪浪」二字。藏於定州武警醫院內。俞瑩攝於 2023 年 3 月。



圖 12 董邦達 《御製雪浪石詩》立軸局部 1746 年 紙本設色 190.4×122.3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 董邦達 《御製雪浪石詩》卷局部 1746 年 紙本設色 16×38 公分（本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張若靄 《雪浪石圖》立軸
1746 年 紙本淡設色 184.5×98.3 公分
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



圖 15 張若澄 《後雪浪石圖》立軸
1766 年 紙本墨筆 183.4×93.1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錢維城 《畫雪浪石並書乾隆帝雪浪石記》局部 手卷 紙本墨筆 29.7×201.3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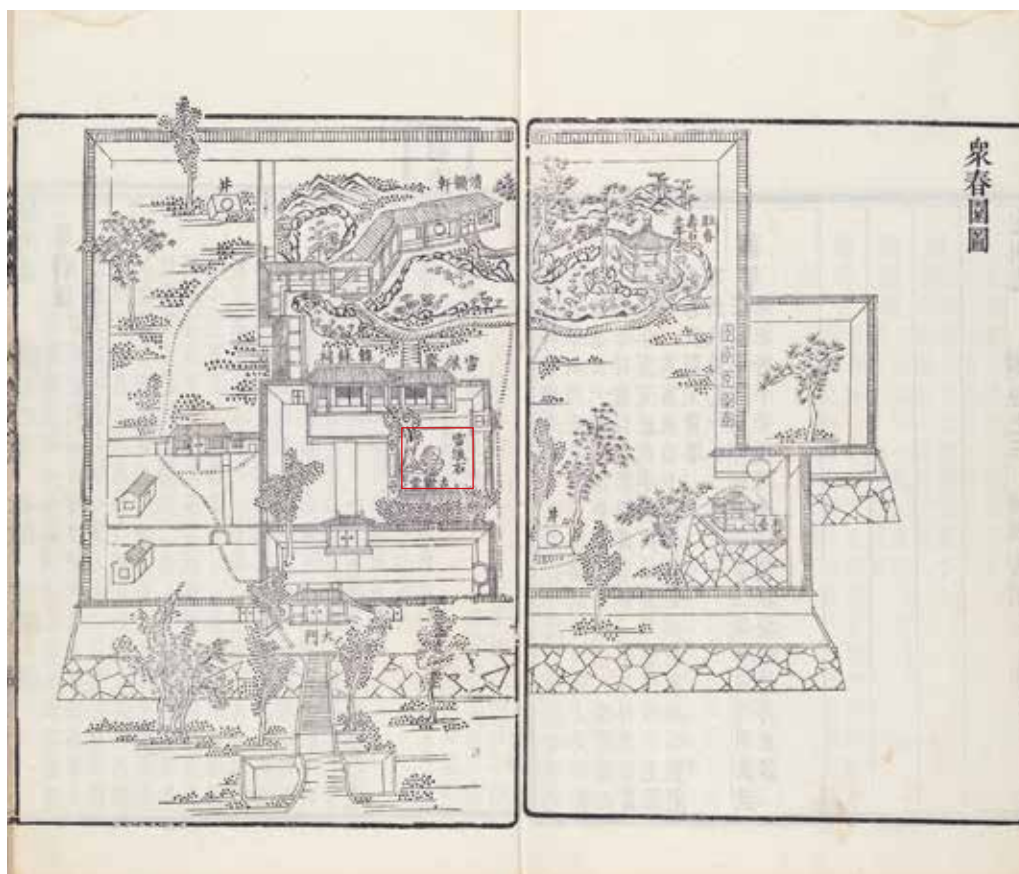


圖 17 「眾春園圖」，出自寶琳、勞沅恩編，《直隸定州志》卷五。紅色框出來的只有一塊雪浪石，根據形態判斷，應為前雪浪石。

